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人文学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扩展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奚爱国 吴胜兴 常本春 朱毅民
吴建坤 米其智 蒯建华 郭东升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刘步健
副主任 陈 锋 朱 杰 夏 涛 钱照亮
魏晓蕾

编 委 (按笔画为序)

韦 敏 任世红 李 业 李 军
吴元庆 张吉林 张美云 张思东
陈 思 龚万达

主 编 朱 杰

副主编 陈 思

目 录

2023年 第5期 总第145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吉 强
责任编辑:蒋建忠 鲍跃华 王天海 宋 好

本期特稿

从政党政治角度看美国当前面临的危机 / 钟伟云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地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应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统一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讲话的词频分析 / 杜治洲 卢佳琦 11

统战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历史演进——基于“概念史”的分析 / 桂 余 徐岑琛 20

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话语体系构建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 / 黄晓妹 27

新时代数字海外统战工作能力建设探析 / 翟 阔 金 新 34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 年 10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民营经济

- 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驱动因素、潜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 李兰翔 丁永坚 卢文俊 41
- 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机制与效果研究 / 马 骏 杨 辉 46

新视野

- 结构功能主义辩证分析框架的重新审视:回到马克思的视角 / 王 里 李 扬 61

学习与思考

- 大思政格局中的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体系研究 / 李媛媛 71
-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实现“双创”目标的思考与探索 / 肖丽丽 王 妍 77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0 * 2023 - 05

从政党政治角度看美国当前面临的危机

钟伟云

摘要:美国当前正面临多重危机,这是美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美国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特别是美国政党政治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的发展变化,与美国当前危机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透过政党政治这面棱镜,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面临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反过来,透过这些危机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清美国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的弊端。

关键词:美国;政党制度;政党政治;极化;危机

当前,美国正面临多重危机。美国如何应对这多重挑战,事关美国未来的发展。美国的多重危机当然是美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而成。但美国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特别是这一制度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的发展变化,与美国当前危机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透过政党政治这面棱镜,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面临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反过来,透过这些危机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清美国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存在的问题。本文从政党制度、政党政治的角度考察美国当前的危机,试图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

一、美国当前面临的危机

虽然说“美国已经衰落”或“美国正在衰落”为时尚早,但是毫无疑问,美国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人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归纳这些危机,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 社会分裂

美国人一直以美国是个民族大熔炉而自豪。她曾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拥抱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不论移民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能把他们改造成说英语、接受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美国人”,或者说“美利坚民族”的一分子。现在,“熔炉”功能正在消失,“美利坚民族”意识正在淡化,不同肤色、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正在强化。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美国“民族熔炉的同化作用逐渐被多元文化所取代”,“对种族多样性的强调,正使美国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1]。2018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说,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我们将自己划分进对立的阵营,而这种对立分裂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出现了更多

收稿日期:2023-09-18

作者简介:钟伟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非洲和美国政治。

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温和派日渐式微，随着中间派越来越少，党派对立愈发明显^[2]。

（二）债务危机

二三十年前，债务对美国来说还不是个大问题。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为5.67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36.6%。进入21世纪以后，联邦政府债务如滚雪球般迅速扩大，2010年，债务总额增至13.56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72.4%。2020年，债务总额进一步增至27.74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05.6%，债务首次超过经济总量。2023年9月，债务总额突破33万亿美元。有专家预测，到2050年，美国联邦政府欠债将达到50万亿美元。除联邦政府外，美国各州及地方政府也负债累累。巨额债务不仅使美国财政还本付息越来越吃力，让未来一代背负沉重负担，还可能导致债务违约，危及美元霸权地位，而一旦美元霸权地位丧失，美国的霸权地位也就难保了。

（三）民主失灵

2020年美国大选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式民主的弊端。时任总统特朗普指责竞争对手选举舞弊，不仅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还煽动支持者冲击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进行无原则的斗争，大搞否决政治，除国防和对外政策外，凡是执政党支持的，在野党就反对，反之亦然。因两党就财政支出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而导致联邦政府关门的次数越来越多，关门时间越来越长。国会多数党利用简单多数强行通过法案，美国建国时期的先贤们所担心的“民主的暴政”正在成为事实。2022年10月，美国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只有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制度运转良好。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案都充满了政治色彩，最高法院推翻它自己此前做出的有关堕胎的判决撕裂了社会，就是其中一例。

（四）社会治理出现危机

美国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其中最突出的有暴力犯罪、枪支管控、毒品泛滥等。美国

哈佛大学创办的记录涉枪暴力的网站“枪支暴力档案”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涉枪暴力死亡人数达45 222人，创下自1968年有该项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2022年，美国涉枪暴力死亡人数为44 186人，其中超过2万人死于他杀。2023年9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一份报告称，2022年，美国死于药物过量人数超过10万人，其中约75%的药物过量导致的死亡是由芬太尼等合成阿片类药物造成的^[3]。

二、美国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

美国多重危机的形成与发展，与美国政党制度、政党政治的演变有密切关联。在考察这种关联前，有必要对美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作简要介绍。对美国政党制度的特征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归纳，下列几个特征对于我们理解美国政党政治及其与美国当前危机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一）非制度化的两党体制

美国政党制度的最突出特征，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在政坛占据支配地位，两党轮流执政。从总统所属的党派看，1901年至2021年的120年间，共和党总统执政共62年，民主党总统当政共58年。两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时间长度也相差不多，在许多年份，两党分别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形成共治局面。

美国宪法没有关于政党或政党制度的条文，但规定人民有结社自由。美国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政党，当前除民主党、共和党外，还有其他数十个政党，这些政党名不见经传，党名五花八门，如“大麻合法化党”“阿拉斯加独立党”“自由至上党”“绿党”“宪法党”等。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经常有其他政党候选人出现在选票上。例如，1992年总统选举，罗斯·佩罗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并获得19%的普选票。但第三党候选人从未赢得过总统选举。国会两院席位几乎由两党占据，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有第三党或独立议员产生。有人说，两党制已经成为美国一种“准宪法安排”^[4]。

民主党和共和党能够独霸美国政坛与美国独

特的选举制度有关。简单地说，美国实行“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又译“胜者全得”)的选举制度，即在一个选区或州获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获胜。以总统选举为例，总统候选人在一个州所得选票只要比其他候选人多一票，就得到该州所有选举人票，不论他的得票率是否过半。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罗斯·佩罗虽获得全国19%的普选票，但未在任何一州得票超过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因此他未获得任何一张选举人票。与此类似，在国会议员、州长、州议会议员等选举中，也是得票最多者赢得选举，不论他们的得票率是否过半。

这种选举制度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对于想参政的人来说，只有选择排在前面的两大政党中的一个作为平台，才有希望获胜。对于两党的坚定支持者来说，他们一般会按党派投票。对于党派立场不那么坚定的中间选民来说，理论上他们可以将选票投给第三党候选人，但实际上，他们的选票大多还是投给了两大政党候选人，因为他们在投票时面临一个两难选择：与其将选票投给没有胜出希望的第三党候选人，还不如投给民主党或共和党中自己比较不厌恶的候选人。这种选举制度使第三党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自1998年以来，在联邦国会两院选举中，仅产生过一名无党派议员。

(二) 总体偏右的政治光谱

在政党制度最早诞生的欧洲，各类政党从左到右可分为三大类，靠左的是左翼政党，包括共产党、工人党等，位于中间的是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靠右的是像英国保守党、德国基督教政党这样的保守主义政党。过去二三十年，欧洲右翼中又产生出像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奥地利人民党这样的极右政党。以欧洲国家政党的政治光谱来衡量，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属于右翼政党，其中民主党属于中右，共和党属于极右。共和党的政治光谱相当于法国国民阵线和德国选择党，民主党的政治光谱则相当于欧洲国家

的保守主义政党。

虽然总体偏右，但两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还是有明显区别。共和党有比较清晰明确的意识形态，核心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更忠实于美国建国先贤们确立的建国原则，信守传统，反对大政府，反对政府干涉个人生活和个人自由；强调个人责任和企业家精神(奋斗精神)，反对高税收；强调个人慈善，反对建立过度的制度化福利。与共和党相比，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没有那么统一，而是更加多样化。民主党更加偏向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少数族裔和少数群体权利，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主张政府对经济实行适当干预，普及社会保障，提高社会福利。为了达到它所主张的社会目标，民主党主张实行高税收政策，特别是对富裕阶层征收高税收。

(三) 非对称的组织动员方式

世界政党的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三大类型。一类是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立的政党，主要是共产党。它们有明确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奉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入党退党有严格程序。另一类以欧洲传统政党为代表，它们有比较清晰的意识形态，相对稳定的组织机构和领导机构，在很多情况下下级服从上级，但决策过程强调民主，组织较为松散，入党退党程序简单，对党员没有严格纪律要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与前两类政党有很大不同。它们均无严密的组织，无固定的党员队伍，无一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成员，对党员无明确的纪律要求，联邦、州及地方的党组织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没有专门的党员登记和管理机构，党员只在政府为选举而进行的选民登记时表明自己的党派身份。

美国两党尽管具有不同于欧洲传统政党的共同特征，但在组织方式上还是有一些差异。美国学者迈特·格罗斯曼和戴维·霍普金斯在《美国政党政治》一书中，用“非对称”一词来描述两党的异同^[5]。他认为民主党是一个由不同利益群

体组成的松散联盟，而共和党则是一个由共同意识形态驱动的有向心力的组织。民主党像是一顶大帐篷，帐篷下是一张张圆桌，每一张圆桌都代表一个利益群体，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彼此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而共和党更像是一个大教堂，以中间的祭坛或讲坛为中心，一排排椅子围着这个祭坛或讲坛逐次由中心向外分布。把共和党人凝聚到这个教堂的不是某些利益，而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越是靠近祭坛或讲坛中心的人，对保守主义就越忠诚。

在动员方式上，两党也存在差异。民主党主要以唤起和激活选民的独特身份来进行政治动员，它以选民关心的各个特定议题为重点，为这些特定议题提出解决方案，以此来吸引选民的注意力和支持。它的动员方式为“菜单”式，针对不同选民群体所关心的问题开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即“菜单”。例如，在移民问题上，民主党主张放宽移民限制，允许非法入境者加入美国国籍，允许选民邮寄选票，等等；在劳工问题上，民主党主张提高最低工资，为劳工提供更好的劳动保障；在医保问题上，民主党主张建立强制性的全民医保体系。共和党则主要以意识形态原则而非在特定议题上的具体主张来动员选民。保守主义诸原则是共和党用来进行政治动员的口号。共和党的主张一般比较笼统、抽象化，原则性较强。

两党的选民基础也有所不同。民主党的选民基础更加多样化，在族裔和社会阶层方面都是如此。民主党的支持者中既有白人，也有各少数族裔，其中少数族裔构成了该党的主要支持基础。虽然并非所有的少数族裔都支持民主党，但少数族裔中多数人相信民主党的理念更符合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从地域分布看，民主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大城市。而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则相对单一，白人构成其支持者主体。虽然并非所有白人都是保守主义者，但持保守观念的白人大都是共和党人。另外，少数族裔中持保守主义观念者，也可能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从地域上看，共和党

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大城市郊区、小城市和农村地区。

（四）既斗争又妥协的精神

两党合作与相互妥协曾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突出特点。自19世纪中叶美国两党制格局形成后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党内都存在不同派别。民主党人普遍持自由主义立场，但党内也有保守派；共和党的底色是保守主义，但党内也有自由派。有学者形容这种局面为“两党四派”或“四党体制”。例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南方各州的白人民党人在政治主张上更接近传统的共和党人，而北部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共和党人在观念上更接近传统的民主党人。在这种格局下，两党要在重要议题上达成妥协和合作比较容易。美国政治学者雅沙·蒙克在其《人民与民主之争：为什么我们的自由处于险境以及如何加以拯救》一书中指出：“在美国联邦层面，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类似于不同利益的松散联合，许多民主党人甚至比共和党人更加保守。所有这些都确实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会是一个谦让成风的地方，政客们经常在公共支出或司法任命问题上达成妥协。尽管美国人自己在从外交政策到摇滚乐的方方面面都存在严重分歧，但高层政治相对来说并不是针尖对麦芒。”^[6]民主党的候选人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持保守立场，而共和党候选人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持自由派立场，这样不管谁当选，都不会完全推翻对方政党的政策，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都不会有很强烈的被排斥感。这是美国在建国后两百年间党争一直比较温和理性的原因。

三、美国政党政治的变异及其影响

近二三十年来，美国政党政治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异过程，其突出表现就是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极化现象”。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党政治出现过一次“大筛选”，即党员重新站队的过程，两党中在意识形态与立场上接近另一党的选民，脱离本

党向另一党靠拢。这主要是民主党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推行民权运动的结果。民权运动使南部各州保守的白人民主党人集体转向共和党。而北部特别是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各州的温和共和党人，由于他们在堕胎、妇女权利、同性恋、跨性别等议题上的观点接近民主党，此时也集体脱离共和党而投奔民主党。至此，美国政坛上原来的“两党四派”或“四党体制”被打破，形成两个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鲜明、有明确界线、相互对立的政党，两党内部更加“同质化”。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策主张上曾有过一段趋同化的时期。冷战结束后，美国人沉浸在冷战胜利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实惠的喜悦中，两党虽然完成了重新站队的过程，但在许多政策主张上趋于一致，两党合作精神犹存，以至于在选举时人们难以区分两党的政策主张。例如，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主张严格财经政策，致力于消除财政赤字，而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也致力于搞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然而，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政党政治迅速极化。首先，两党都更加意识形态化。民主党变得比之前更靠左，向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方向发展；而共和党则变得比之前更加靠右，向极右民粹主义方向发展。其次，两党对重大问题的看法差距日益拉大。几乎在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上，两党立场的差距都在日益拉大。最后，两党合作与妥协精神消失殆尽，日益针锋相对，互不妥协。国会投票中以党派划分立场的现象日益明显，过去那种跨党投票的情况日益减少。《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评论说，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的美国两党更像是“两个敌对的部落，而不是像殊途同归的同胞”^[7]。过去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党派合作精神已荡然无存。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当人们处于同一个国家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时，集体行动就变得非常困

难^[8]。政党政治极化对当前美国危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政党政治极化阻碍了美国社会对重大挑战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我们看到，尽管许多美国人都对国家面临的深重危机看得很清楚，但两党就是拿不出解决办法。例如，在债务问题上，美国两党都想利用执政地位多花钱，认为多花钱是自己的权利，都想通过多支出来达到本党的政治目的，但对于如何增加收入，则难以达成共识。民主党主张增税，特别是对富人增税。而共和党则主张减税，特别是对富人减税。双方都想利用对财政支出的控制权来讨好各自的选民，其结果必然就是债务越积越多。又如，在移民问题上，共和党主张收紧控制，而民主党则主张放松控制，双方的目的都是争取选票。共和党想保住白人“基本盘”，认为移民增加会破坏族裔比例，使人口结构有利于民主党。民主党则希望放松移民管制，因为多数新移民都支持民主党。再如，在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上，两党为了讨好各自选民，都从原先强调民族熔炉政策退回到强调多样性政策，特别是民主党，主张少数族裔应该保持各自的独特性。在涉枪暴力问题上，民主党主张加强枪支管控，共和党则强调持枪权，对枪支犯罪泛滥视而不见。

在重大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是造成当前美国社会空前分裂的主要原因。总统和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更替，很可能改变国家的发展方向。每一次选举对国家团结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人们对国家再次陷入内战的担忧再度上升。

第二，政党政治极化使政客们目光短浅。他们只顾眼前选战的胜负，难以集中精力思考国家长远发展问题。有人形容美国的政治竞争像是一场体育比赛，只看眼前胜负，也只争眼前胜负。例如，民主党内也有许多人明白大量低端非法移民涌入美国，从长远看很可能不利于美国，但为了扩大支持基础，民主党宁愿饮鸩止渴。

第三，政党政治极化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下降。党派之间的恩怨、人身攻击、相互质疑，使部分民众对国家政治以及领导人的信心逐渐丧失，公众对政府的认可度空前降低。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政，政府的支持率都很难超过半数。特朗普总统在其四年任期内，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率始终未超过50%，拜登总统的支持率甚至更低。民调显示，2022年，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为43%，比上一年下降5个百分点，比2017年下降10个百分点^[9]。

第四，政党政治极化损害了美国制度中的自我纠错能力。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发现错误并及时加以纠正是美国制度的最大优势。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始终隐藏着一种力量，就是通过不断地发现并纠正政府的缺点和错误而推动社会的普遍繁荣。”^[10]自我纠错能力既来源于美国的分权与制衡机制，也来源于党派的合作精神。现在政党之间针锋相对，相互否决，几乎到了是非不分的程度，自然就很难纠错了。例如，美国多数人包括两党领导人都清楚债务危机的严重性，都明白当前联邦政府的花钱方式是错误的，但都没有意愿和能力纠正这一错误。

四、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使美国的政党政治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迅速走向极化？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与美国的宪法制度、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等因素有关，下列四个因素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党派“大筛选”的后果。两党的重新站队，等于为两党完成了一次“清党”的过程，使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更加“纯洁化”。这为两党后来走向极端化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基础。

第二，政治干预选区划分。美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根据人口变化情况重新确定众议院席位在各州的分配。各州的执政党利用这一机会，使选区重新划分对本党有利。其通行做法是，

将本党支持者尽可能划在同一个选区，这样就可确保不论本党推出谁来竞选都能取胜。这种选区划分的结果是两党的“安全选区”数量日益增多。所谓“安全选区”，就是选区内本党支持者占多数，不论本党推出谁来代表本党竞选都能获胜。这样，“安全选区”的党内初选就具有决定性意义，降低了大选中投票的重要性。由于参加党内初选的人大多数是意识形态坚定分子，他们趋向于支持那些在意识形态上持同样坚定立场的候选人，因此，在初选中胜出的往往也是意识形态坚定分子，持中间温和立场的候选人很难得到足够的支持。成功当选者要想在下次选举中竞选连任，也要表现出强硬的意识形态立场，否则就有可能被党内持更加极端立场的挑战者拉下马。在2022年中期选举的党内初选中，包括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利兹·切尼在内的一批共和党温和派就被党内更加激进的挑战者击败。利兹·切尼是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女儿，她担任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会议主席，是众议院共和党三号人物，立场上属于温和派。她因投票支持弹劾特朗普总统，参加以民主党议员为主的调查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委员会，而遭到共和党强硬派的仇恨。她在党内的被排挤表明，共和党已经容不下温和的声音。我们可以看到，共和党内持中间温和立场的当选者越来越少，持极端立场的人越来越多。

第三，利益集团的游说。时代越是向前，美国人竞选公职的金钱成本就越高。虽然法律对竞选筹资方式（如个人捐款的额度）有规定，但候选人仍需要利益集团为他们出资竞选。利益集团也可轻易找到方法绕过法律障碍为他们所选定的候选人助选。而这些利益集团的捐款都有特定条件，候选人一旦当选，就得为它们的利益服务。利益集团也有一套办法监督它们所资助政客从政行为，如果某位政客“不听话”，它们可以通过支持其竞争对手来惩罚他。而利益集团五花八门，利益相互冲突，它们各自支持自己中意的政客，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政客们走极端、不妥协。

第四，新媒体的催化。新媒体特别是自媒体往往偏爱对极端立场和言论大加传播。越是极端的言论，传播就越快，点击量就越大，对人们的影响就越大。政客们为吸引公众注意力，往往走向极端。如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极端言论虽然令许多人反感，但却对他牢牢拉住支持者起了重要作用。受政客们极端化言论的影响，美国普通大众的政治意识也日益极端化，普通大众思想意识的极端化，反过来又助推了政客们立场的极端化。另一方面，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政客们在立场上的任何微小调整，都会被新媒体解读为对本党、原有意识形态和原先承诺的背叛，从而受到谴责。这在客观上又使政客们容易走极端、不妥协。在新媒体的影响下，美国传统媒体为吸引受众，其意识形态和党派倾向日益明显。例如，福克斯新闻频道已经成为共和党和保守主义的喉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日益向民主党靠拢。

上述这些因素都内化于美国社会，从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于消除，因此，要改变美国当前政党政治的极化状况并非易事。有美国学者用“钙化”这个词来形容当前政党政治极化现象，表明形势已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

五、结语

美国建国先贤们对党派斗争的极端化早有警惕。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曾经设想，美国应通过增加政党的数量来解决党派恶斗问题，因为政党数量越多，某个党派获得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就越小。在建国后近两百年间，美国的党争基本上按照建国先贤们的设想发展，虽然政坛被两大政党占据，但两党内有众多派别，党内各派之间相互制约，加上两大政党相互制约，使美国的党派斗争一直较为温和，国家也能够克服一次次严峻挑战而保持团结。今天美国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应该大大超出建国先贤们的设想，

许多危机现在面临着无解的局面。有学者认为，美国需要一场像二战这样的重大危机才有可能打破政党政治极化状况，或许到那时两党才会回到斗争、妥协、合作的轨道上来。如果美国不能很好地处理政党政治极化问题，真正走向衰落并非不可能。

参考文献：

- [1] 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 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 [M]. 韩莉，韩晓雯，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5.
- [2] Hillary Rodham Clinton. Class Day Address at Yale University [EB/OL]. (2018-07-06). <https://awpc.cattcenter.iastate.edu/2018/07/06/class-day-address-at-yale-university-may-20-2018/>.
- [3] 报告：美国去年超 10 万人死于药物过量 非法毒品将成国家安全最大威胁 [EB/OL]. (2023-09-16).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3-09-16/doc-imzmwinn1367655.shtml>.
- [4][7][8] 弗里德曼，曼德鲍姆. 曾经的辉煌——我们在新世界生存的关键 [M]. 何帆，朱振鑫，金程，等，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359、262、253.
- [5] 格罗斯曼，霍普金斯. 美国政党政治 [M]. 苏淑民，译.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4.
- [6] 蒙克. 政党国家化和两极化在摧毁美国政治 [EB/OL]. (2018-08-24).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4501&page=0>.
- [9] 朱瑞卿，孙丁，熊茂伶. “美国病了”——起底美国的制度性衰落 [EB/OL]. (2022-10-02).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2_10_02_660382.shtml.
- [10]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 [M]. 周明圣，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4：284.

责任编辑：宋好

地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应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统一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讲话的词频分析

杜治洲 卢佳琦

摘要: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在22个省(区、市)考察讲话内容进行词频分析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讲话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具体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一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二是加强对地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三是各地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必须有重点地推进;四是结合地方优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五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采用不同的策略。地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协调,更加注重发挥地方优势;必须坚持全面性和重点性的平衡,更加注重重点突破;必须强化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的统一,更加注重服务人民。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词频分析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深刻总结管党治党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战略举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然而,在现实中出现了各种花样的“变质问题”。例如,有的地方党委不抓总、不统筹,党的建设部门化^[2];少数地方和单位,“四风”问题堆积,潜规则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严重恶

化^[3]。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纪委全会等重要会议上多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地位及战略意义,而且在地方考察时也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提出了更好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笔者利用NVivo12软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考察时作出的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进行词频分析,尝试分析和呈现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及其特点。

一、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

根据《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部分重大会议

收稿日期:2023-08-17

作者简介:杜治洲,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燕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廉政政策与数字治理;卢佳琦,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的讲话，笔者分析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各级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这就意味着省市及基层党组织，肩负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责任。不仅如此，要想办好一个地方的事情，关键在党、更在全面从严治党。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希望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总体要求。

（一）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具有严肃性和强制性，一经制定就要严格执行。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4]，“要增强大局意识、战略意识，善于算大账、总账、长远账，不能只算地方账、部门账、眼前账，更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为了暂时利益损害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5]。这就意味着即使地方考核压力再大，也不能“关起房门、卡住入口”，必须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严防“变质”政策的出现；地方党员干部要坚持有令必行、令行禁止，严格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把政策落实到位，这不仅是政治品质，也是责任要求。同时，还要树立正确积极的政绩观，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二）科学合理使用干部，严格管理干部

从严治党的关键是从严治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建设“清廉中国”的重要力量源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人得当，就要科学合理使用干部，也就是要用当其时、用其所长”，“用什么人，用在什么岗位，一定要从工作需要出发，以事择人，不能简单把职位作为奖励干部

的手段”^[6]。

（三）深化运用“四种形态”

党的十九大把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写入党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指出，“充分运用‘四种形态’提供的政策策略，通过有效处置化解存量、强化监督遏制增量，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7]，将“四种形态”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政策策略。“四种形态”的深化运用，虽释放出了轻刑罚的信号，但不代表从轻处理，要求地方深化运用“四种形态”的目的还是为了培育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廉洁文化^[8]。

（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纪检监察队伍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是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面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忠诚干净担当、专业化能力强、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9]。地方为贯彻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要求，必须对纪委自身建设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加强本地区的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创新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创新纪检工作培训理念、方法，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强弱项，致力于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纪检监察队伍，从而更好地履行监督责任。

（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10]。基层干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难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11]。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要求地方多元主体协同开展，持续整治老百姓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

对“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作出了战略部署。在此之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对新时代伟大使命的重要意义。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12]。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也都突出了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的重要性。

二、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统一

本文开展词频分析的文本资料来源于2014年12月至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讲话中有关“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容（见表1）。笔

表1 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时的讲话主旨与重点摘要^①

时间	省份	讲话摘要
2014.12	江苏	主旨：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 ①从严治党的重点，在于从严管理干部，要做到管理全面、标准严格、环节衔接、措施配套、责任分明 ②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任务，需要大气候，也需要小气候 ③各级党组织要主动思考、主动作为，通过营造良好小气候促进大气候进一步形成
2015.01	云南	主旨：认真地、深入地解决党内矛盾 ①各级党委组织严肃对待党赋予的职责 ②进行严格的组织管理 ③结合实际建立健全管党机制 ④各级领导干部严格要求自己，做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好干部
2015.02	陕西	主旨：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 ①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 ②把抓理想信念贯穿始终 ③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④始终为党和人民事业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2015.05	浙江	主旨：坚持标本兼治，把执法执纪贯穿起来 ①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干部工作中的问题 ②“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要突出问题导向，贯彻从严要求 ③健全工作目标责任制 ④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
2016.01	重庆	主旨：领导干部在“三严三实”上发挥表率作用 ①严格纪律规矩、依法办事、正确用权 ②领导干部要把理想信念体现为行动的力量 ③要有坚持原则、不折不扣的执纪过程 ④领导干部要脚踏实地、实干苦干
2016.02	江西	主旨：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新的时代光芒 ①各级领导干部坚持理想信念，并且将信念转化为行动 ②保持艰苦奋斗本色 ③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 ④认真践行党的宗旨
2016.07	宁夏	主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①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 ②增强宣传思想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③全面推进县乡村各级各领域党的建设 ④严格要求并关心广大基层干部
2016.08	青海	主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①各级党组织自觉担当责任 ②严格按照党的纪律和政治规矩办事 ③处理好权利和义务、权力和责任、激励和约束、惩处和保护等方面关系 ④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性、推动事业发展

注①：图表为笔者自制，资料内容源于人民网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

时间	省份	讲话摘要
2017.04	广西	主旨：建设好领导班子是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的关键 ①提高领导班子思想政治水平、专业化水平 ②各级领导干部要勤学苦干、多思善悟 ③全面取得领导工作主动权 ④注重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培训
2017.06	山西	主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①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②教育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和自我监督 ③融通党的优良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④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转化为促进党的事业发展的持续动力
2018.06	山东	主旨：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①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固本清源，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②领导干部必须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
2018.10	广东	主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①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②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③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④继续推进作风建设，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2018.11	上海	主旨：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 ①坚持严字当头，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②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 ③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队伍 ④加快培养各领域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⑤广开进贤之路，广泛集聚各方面优秀人才 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⑦高度重视意识形态
2019.05	江西	主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①继承和发扬红色革命传统 ②将基层减负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 ③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④加强真抓实干的作风建设
2019.08	甘肃	主旨：运用红色资源，认真抓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①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②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这个总要求 ③要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 ④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
2019.09	河南	主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①主题教育层级下移，线长面广 ②注重分类指导，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③切实把党中央关于主题教育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2020.03– 2020.04	浙江	主旨：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党建工作紧紧抓在手上 ①抓实党员、干部的经常性教育 ②各级党组织重视联系群众 ③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④为基层减负，让干部更有精力抓落实
2020.04	陕西	主旨：各级党委切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①坚持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 ②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③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 ④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时间	省份	讲话摘要
2020.05	山西	主旨：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①坚持不懈抓好党内政治生态建设 ②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③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④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2020.07	吉林	主旨：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组织建党和思想建党有机结合 ①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 ②严格把好选人用人政治关、廉洁关、能力关 ③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 ④全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基层减负常态化机制 ⑤创新人才工作政策、体制机制、方式方法 ⑥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⑧把政治生态建设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
2020.08	安徽	主旨：人民是党的执政基础 ①践行党的宗旨，树牢群众观点 ②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③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 ④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⑤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群众身边延伸
2020.09	湖南	主旨：让红色基因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石 ①党员干部要加强思想建设、传承红色基因 ②加强村为民服务中心建设 ③严厉打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腐败现象 ④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2021.03	福建	主旨：依托当地红色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①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做到学史明理 ②要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③要不断提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综合功效，持续巩固发展良好的政治生态
2021.06	青海	主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做到学史崇德 ①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涵养高尚道德品质 ②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2021.07	西藏	主旨：学史力行是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 ①要在锤炼党性上力行 ②要在为人民服务上力行 ③要在推进发展上力行
2022.04	海南	主旨：坚持严的主基调，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①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 ②要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③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④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着力解决“本领恐慌”、能力不足的问题 ⑤要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扩大党组织有效覆盖 ⑥要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准确把握反腐败斗争新的阶段性特征
2022.07	新疆	主旨：切实抓好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 ①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范 ②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③切实改进基础工作作风 ④夯实基层基础 ⑤优化党政领导班子结构，注重发挥少数民族干部作用
2022.10	陕西	主旨：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而团结奋斗 ①传承延安精神 ②继续推进老一辈开创的伟大事业 ③全党同志站稳人民立场 ④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 ⑤勇于推进自我革命 ⑥发扬斗争精神

者将汇总的全部资料按整体、个体、地域地区三种形式，分别使用软件进行词频分析，同时将一些词频相对较高的虚词和关联度不高的实词人工剔除，从而得到最后的词频分析结果。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具体要求（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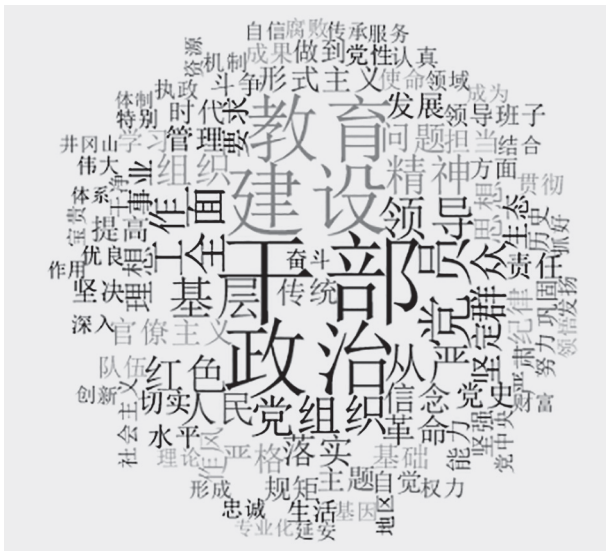


图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讲话词云图

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高频词进行人工筛选分类后发现，排名靠前的高频词可分别归类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党员思想教育、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四个方面（见表 2）。

表 2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讲话高频词分类

类别	高频词（频数≥3）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政治、工作、从严、全面、严格、管理、问题、作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纪律、择人、规矩、严肃、机制、权力、腐败、体系、标准、廉政、执纪、正气、职责
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干部、事业、学习、能力、队伍、领导班子、艰苦奋斗、干净、忠诚、服务、创新、专业化、本领、目标、道德、高尚、主动、人才、培训、自力更生、苦干、高素质
党员思想教育	教育、精神、红色、思想、革命、传统、信念、理念、斗争、主题教育、党史、历史、自觉、优良、延安、使命、党性、理论、自信、特色、资源、井冈山、故事、文化、激励、党风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基层、人民、群众

（一）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地方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坚决贯彻党的宗旨，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推进。“基层”“群众”“人民”三个词在习近平总书记地方考察相关讲话中出现的次数分别是 23、21、21，频率极高。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人民本位”。分析相关讲话内容，可发现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要求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认真践行党的宗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努力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集中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一线、向群众延伸，彻底清除群众身边的腐败，遏制基层腐败增量，切实保障群众的利益不被侵害，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感和安全感，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二）加强对地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

党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是党的形象代言人，还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干部”一词共出现 64 次，是出现次数最多的词。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时，多次强调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教育引导干部永葆初心、永担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要求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廉洁文化建设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基础。要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增强领导干部不想腐的自觉。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红色”“传统”“故事”“文化”等词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意味着要求地方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红色基因，用活红色资源，从中挖掘廉洁元素，把其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素材，以形塑廉政规则，推动廉洁文化建设。

另一方面，党员干部教育工作是党的建设的

基础工作和长期工作，必须要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使全体党员树立坚定信念。“干部”“教育”“党史”“培训”等词的高频出现，意味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教育工作（见图2）。从讲话内容可以发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地方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领党员学史力行。这就说明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形成多样化廉洁文化体系的同时，还要补充课堂、讲座、传媒和实践等社会化场域，以形成廉洁氛围。讲好红色故事，要不断创新形式，如建设红色教育基地、拍摄红色宣传视频、编写红色读本等形式，将看不见的红色精神转化成可读、可视、可听的精神食粮。这些措施对于加强我国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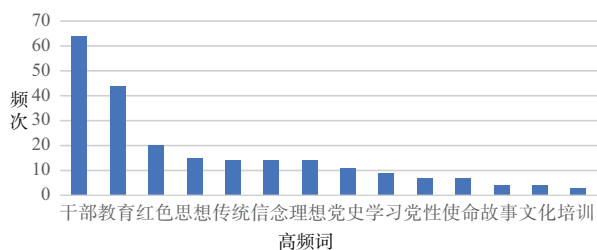


图2 干部教育管理相关高频词

（三）各地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必须有重点地推进

由于不同地方的情况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对各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各有侧重。例如，对出现塌方式腐败、政治生态严重破坏的地方，更加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守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让党员干部将“精气神”转向发展建设，心存敬畏、秉公用权、廉洁自律，坚决“管住自己的手脚”。对人才资源相对稀缺的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比较注重抓好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提升“一把手”的能力和本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作用，要求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对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广东，侧重于政商关系的处理，要求完善规范政商交往的制度，从严管理监督干部行为，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四）结合地方优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对习近平总书记在22个省（区、市）考察时的讲话分别进行词频分析后发现，各省的高频词与该地所具有的资源优势紧密相关（见表3）。例如，在江西、陕西、甘肃、湖南等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利用好红色资源优势，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继承和发扬优良革命传统，并从革命精神中汲取养分，创新党员教育内容和形式。在广东、上海、浙江等经济繁荣的地方，强调要利用好经济发达优势：一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不仅要吸纳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加入，还要争取把有本领的人留住；二是开展全方位的从严治党工作，争取更多的财政预算以开展特色党建活动、教育活动等，营造廉洁的社会环境。

表3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讲话词频分析结果

省份	时间	高频词（频次）
江苏	2014.12	从严（4）、管理（2）、主动（2）
云南	2015.01	干部（7）、管理（7）、严格（3）
陕西	2015.02	延安精神（3）、优良（革命）传统（3）、优良作风（3）
	2020.04	精神（4）、干部（3）、政治（2）
	2022.10	人民（5）、自力更生（3）、艰苦奋斗（3）
浙江	2015.05	干部（5）、教育（4）、基层（3）
	2020.03-2020.04	干部（5）、教育（4）、基层（3）
重庆	2016.01	干部（4）、理想信念（3）、依法办事（2）
江西	2016.02	井冈山（4）、群众（4）、干部（2）
	2019.05	主题教育（2）、地区崛起（2）、作风建设（1）
宁夏	2016.07	体系（4）、基层（3）、群众（2）
青海	2016.08	政治（8）、纪律（3）、规矩（3）
	2021.06	干部（5）、人民（5）、忠诚（3）
广西	2017.04	领导班子（4）、工作水平（2）、政治（2）
山西	2017.06	政治（6）、文化（4）、干净（3）
	2020.05	政治（5）、教育（2）、不正之风（1）
山东	2018.06	权力（3）、干部（3）、思想（2）
广东	2018.10	干部队伍建设（5）、政治（4）、新型政商关系（1）
上海	2018.11	基层（4）、思想（4）、干部（3）
甘肃	2019.08	干部（3）、教育（2）、红色（2）
河南	2019.09	教育（13）、红色（5）、革命精神（4）
吉林	2020.07	干部（3）、政治（3）、教育引导（2）

省份	时间	高频词 (频次)
安徽	2020.08	政治 (5)、人民 (3)、干部 (2)
湖南	2020.09	干部 (2)、教育 (2)、群众 (2)
福建	2021.03	党史 (3)、理论 (3)、学习 (2)
西藏	2021.07	党性 (4)、教育 (4)、人民 (4)
海南	2022.04	红色 (4)、干部 (3)、基层 (2)
新疆	2022.07	干部 (3)、基层 (3)、政治 (3)

(五) 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采用不同的策略

通过词频分析发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与该地所处地区附带的资源总量存在关联。在东部地区更加强调完善政治体系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在中西部地区更加强调党员干部教育工作和基层工作。笔者认为造成东中西部地区侧重点不同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相较而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在经济发展势头向上时,蕴藏的廉政风险随之也变得更大,需要加强廉政体系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保持党的活力和纯洁度,避免党的干部遭受腐败的侵蚀;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崛起阶段,加之革命老区分布在此,更加注重利用红色资源开展党员教育工作,整治干部作风问题,致力于提高该地区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从而使其投身于地区的发展建设,不断为地区崛起作出奉献。

三、结论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梳理对地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和特点,有利于各地有的放矢、积极高效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从严治党提出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要求,为此,地方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 必须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协调,更加注重发挥地方优势

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央步调保持一致,但同时也要看到各地不同的优势和不足,要精准施策。由于地方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缘环境不同,导致各地方的发展状况不同,也就使得所面临的反腐败形势不同。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考察时,除了对

地方提出一些基本性要求之外,还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工作汇报,分别提出了针对性要求。地方在落实时必须先弄清楚自己的情况,结合当地的发展规划和资源优势,扬长避短,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举措。

(二) 必须坚持全面性和重点性的平衡,更加注重重点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既需要全方位用劲,也需要重点发力。”^[13]全面从严治党,既强调全面整体推进,又聚焦重点突破,体现的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工程,词频分析结果显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求各地方必须做好这一工作,用好这一重要法宝,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下坚实基础。同时,词频分析还发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地要结合自身的省情,有针对性地、有重点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工作。

(三) 必须强化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的统一,更加注重服务人民

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功能,就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同时,全面从严治党也有重要的服务功能,党必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和生活幸福感。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地方“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群众不认可不罢休,一锤接着一锤敲,确保取得的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14]。从根本上讲,全面从严治党的服务功能与政治功能是一致的,服务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助于密切党和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功能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65.
- [2]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 468.
- [3]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92.
- [4][6]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132、348.
- [5]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EB/OL].(2016-05-10). <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510/c64094-28337020.html>.
- [7]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N].人民日报, 2020-01-14(1).
- [8] 蒋来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理论体系与战略价值[J]. 河南社会科学, 2018(1): 6.
- [9]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 确保“十四五”时期目标任务落到实处[N].人民日报, 2021-01-23(1).
- [10][11] 习近平.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6-05-03).<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03/c1001-28319087.html>.
- [1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61.
- [13] 习近平. 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求是, 2017(1): 5.
- [14] 习近平.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20-01-09(2).

责任编辑: 王天海

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历史演进

——基于“概念史”的分析

桂 余 徐岑琛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民族概念展开了不同的设计。一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前,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除“民族内部阶级对立”;二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无产阶级要组成民族”;三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后,“地域性的人”要向“世界历史性的人”转变。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先后提出“民族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着中国共产党民族观从革命性到现代性再到世界历史性的演进。正确认识以上逻辑有助于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谋大同的历史认同,有助于把握世界民族发展大势。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族观;民族解放;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问题的提出

从理论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因而研究中国共产党民族观,首先需要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内涵要义与逻辑脉络。就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研究的现状而言,已经有学者指出,“国内有些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历史阶段上提出的‘民族’概念不加区分地笼统理解”^[1],并指出这种大而化之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的方法显然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虽然

他们没有系统地对“民族”进行集中的讨论,但其民族的观点和主张散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民族”概念有着不同的内涵。按照社会形态变迁发展规律,大致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前,“民族”大多指代狭隘民族主义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反对民族主义中的偏见和优越感,并指出其本质是“大规模的利己主义”^[2]。第二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后,应该“把自身组织成民族”^[3]。第三阶段,在生产力不断

收稿日期:2023-09-28

作者简介:桂余,江苏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徐岑琛,江苏省委党校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学术中国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建构及其现实启示研究”(19CDJ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持续发展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4]。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结合国情、世情以及时代主题来面对“民族”的复杂性，先后提出民族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概念。这三个概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发展三个阶段的认识，有效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

从现实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民族观面临着繁杂多元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网络民族主义、技术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这意味着，如何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思潮朝着理性合法的方向发展，引导网民将维护民族利益的情感转化为守法爱国的实际行动，从而帮助网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内蕴的理性的爱国主义情感；如何规避技术民族主义思潮所带来的强制性的科技本土化、遏制性的科技排他化、牵连性的科技政治化，引导人们在认知上清楚中国坚持自主创新的高科技发展之路、正视中国科技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从而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非排他性；如何摒弃极端民族主义带来的非理性爱国主义，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设计的民族发展道路是走中华民族共同体道路，不是走极端民族主义道路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此，回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逻辑理路，正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概念的三次顶层设计，应对当今多元民族主义思潮，为未来指明正确的方向至关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5]只有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历史脉络，才能进一步生成和巩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夯实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自信。

二、民族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观的革命性设计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对“民族”的批判性观点大部分散落在为反对泛斯拉夫主义和民族原则而写作的论战文章中，这些观点导致后人在评价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时，常常简单理解为“反民族主义”或者是“非爱国主义”。必须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的批判的确是针对民族主义，但只是针对利己性的民族主义而已，这一观点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斯拉夫主义中的“唯有信仰可以克服个体的局限性”以及斯拉夫主义所带来的民族主义观点的泛滥，并批评其为“大规模的利己主义”中得到佐证。应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这种利己主义的民族性是受到社会历史制约的，即有其自身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和历史的合理性认识，基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第一阶段的认识，也就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前的“民族”的内涵几乎可以和民族主义画上等号。同时，马克思也指出“民族”消失的首要条件，是“民族内部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6]，“民族”也得以实现自我解放，这就将第一阶段的“民族”概念从方法论角度直接指向了无产阶级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正是实现真正地“民族解放”的重要手段。

回溯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是遏制中国实现民族解放的重要因素，同时，“民族救亡压倒民族启蒙”也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近代中国历史所争论的话题之一，无论其结论如何，都可以看到“民族救亡”成为该时期理解“民族”的重要底色。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革命时期，紧扣时代脉搏，救亡图存，提出“民族解放”的重要概念，认为民族解放是事关国家救亡图存、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一认识也从侧面论证了民族解放的革命性特征是其基本特征。其实，“民族解放”本身就带有革命性属性。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自身

的解放，必须夺取政权，赢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从而进一步打破社会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消灭阶级剥削，消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民族解放。可见，在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观”第一次设计中，基本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概念的最早阐述。

第一，以“阶级”重新认识“民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党人在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时期，基本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发展第一阶段的理解。从具体的社会现实看，近代国民党、国社党也因帝国主义入侵、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将“民族复兴”列入其官方话语。特别是国民党，其民族复兴论以恢复“民族精神”为前提，以开展各类民族复兴运动为路径，以推进“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为目标，从军事上、理论上向中国共产党发起进攻。国民党、国社党以“民族精神”为改造国人国民性的观点，以及背后民族主义思想的泛滥，与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斯拉夫主义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面对建立在唯心主义观点上的“民族复兴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明了唯物史观是认识“民族”的科学方法，且从革命的目的性出发，认为必须要从阶级角度来重新认识民族。一方面承认民族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上的限度性、阶段性，另一方面要求各革命阶级在民主自由解放目标下的统一。毛泽东虽然强调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是在整个革命时期并不反对革命中的“民族主义”。就如同毛泽东在 1931 年对民族自决作了一般性的解释，这个解释基本照搬了苏联的民族纲领，即民族斗争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斗争、“主张无条件的民族自决”^[7]等。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在 1940 年依旧强调：“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8]

第二，无产阶级是实现“民族解放”的自觉

领导者。无产阶级是民族解放的自觉领导者，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占据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民族观点，有助于“为建设扫清道路”^[9]。而哪些人来为建设扫清道路是需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解，主体理应是工人阶级。然而工人阶级在当时的中国数量少，是不争的事实，农民、小资产阶级则相对较多。基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对比情况，中国共产党必须为民族解放进行主体设计，就不得不考虑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和对待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态度问题。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无产者、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态度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是从方法上看，民族和阶级在革命时期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那么就不能简单强调阶级而忽略民族本身的历史价值。事实上，从阶级属性看，一些与无产阶级相对的资产阶级、富农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革命力量。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观的现代性设计

安德森在谈论民族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曾这样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民族主义已经证明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异常现象；并且，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掠过民族主义不提，不愿正视。”^[10]从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民族”概念的确是和“民主”“国家”等概念一样，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的解放”而逐渐消失。但是，安德森这种理解仅停留在认识论层面，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仅要做到认识世界，更强调的是改造世界，所以从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角度看，马克思对民族的理解核心并不是在怎样看待“民族”，而是对“民族”进行科学改造，也就是如何构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民族”。马克思认为，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中国也不例外。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经济、军

事和文化侵略下，中国“被动式”卷入现代化的探求与实践之中，现代性变成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本质要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更成为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发展作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次设计，此次设计的核心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一，民族是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走现代化道路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途径。立足中国的现实情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其最根本的任务是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样才有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现代性作为现代化在精神及其价值上追求的特征体现，给予了现代民族主义生存的空间。“现代性——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时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产生的深层起源，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是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根本原因。”^[11]在这种现代性特征下，无产阶级如何自觉地组织成民族，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重要命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的基础上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探索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展开了对“民族观”的第二次顶层设计。

第二，“无产阶级”自身组织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民族解放”的任务得以初步完成。这个时候，统一的民族国家建立后如何对民族进行改造，即一方面既要承认民族国家所要迈向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现代性民族国家所带来的民族主义危机，就成为共产党人需要思考和面对的实际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12]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民族”并没

有消失。从理论逻辑看，赢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本身组成“民族”，这实际上就彻底脱离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概念。

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13]，无产阶级要将自己转化为民族。邓小平也多次阐述，“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无产阶级世界观根本不相容，它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思想，共产党内决不能允许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存在”^[1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着重强调，“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民族团结的大敌，要坚决反对”^[15]。可见，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始终反对狭隘的资产阶级民族概念。当然，单纯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点与无产阶级将自身转化为民族还是有距离的，即单纯的批判不能取代经验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因为共同的地域、语言、文化、经济生活和阶级斗争体验而将“无产阶级”凝聚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中华民族是受尽剥削的民族，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民族解放，实现现代化。而无产阶级自身组织成为“民族”，也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无产阶级要成为民族情感的自觉担当。马克思的追随者之一鲍威尔曾用“品性共同体”来解释民族，这种民族品性随着历史的发展被融合到一起，逐渐形成了“本能的民族感”。这种本能的民族感也会经历“自发”到“自觉”的过程，随着无产阶级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并用无产阶级的政权握住民族的旗帜后，无产阶级本身的任务就是自觉地承担起民族感，这种民族感“本身是合理的和有价值的，所以他认为他的民族的品性也是有价值的，值得发扬光大。因此，凡是符合其民族特点的东西都是合理的，是善的，凡是与其对立的就其是卑贱的”^[16]。这一观点用韦伯的现代性观点来解释似乎更为易懂，就是强调无产阶级应当自发承担起“民族”的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不仅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也肯定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那些现代性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模式。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出绝对不是“民族主义”的复兴。从历史逻辑上看,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一直坚定反对民族主义思潮;从理论逻辑上看,中国民族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所组成的。“中国梦”是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提出的,两者是一个整体,绝不可以分开讨论。从内容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17]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指向的是民族国家现代性问题,也就是中国如何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优秀特质,从民族观上看强调的是无产阶级转化为民族后对民族感的自觉担当;另一方面,“中国梦”是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融入每一个民族个体,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梦,强调了民族复兴的现代性和个体解放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倘若将两者分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便会有陷入民族主义观点的危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工人阶级要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本职、胸怀全局,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以国家主人翁姿态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贡献。”^[18]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观的世界历史性设计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指出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后,自身要组织成民族,还指出了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最终每一个个体的“人的解放”,会促使民族的消亡。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了现代性危机即资本主义的“异化”问题消亡的两个条件:一是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异化”现象会变成一种越发“不堪忍受的”力量;二是“随

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19]。可以发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的设计中,无产阶级所组成的民族也只是在某一历史阶段内才拥有其价值,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发展,无产阶级组成的民族最终会被社会历史性的人所逐渐取代。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把人类社会民族现象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来看待,具有世界历史性,基本观点是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歧视、尊重民族差异,反对民族分裂、倡导民族团结,把民族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组成部分加以解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中的全世界民族大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构想,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性”的理解。经过长期奋斗,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极大提高,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随着世界范围内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交流已经成为可能。并且,由于国际范围内整体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就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世界性危机成为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重要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时,也指出世界性的恐怖主义、冷战思维、强权政治、气候危机、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危机不仅没有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化解,反而愈演愈烈。那么,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生产力发展所带来“异化”已经浮现、人与人的普遍交往逐渐成为现实,打破地域的人的思想束缚,转而构建一种拥有世界视野的世界历史性的人,就成为当下化解世界性危机的重要一环。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对塑造世界历史性的人而言,无疑是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的。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中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概念的第三次顶层设计的思路。

第一,从“世界历史性的人”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一方面,要从“世界历史性的人”来理

解“中华民族”。从理论逻辑看，“中华民族”的主体成分应该是无产阶级所组成的民族，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同样只有在当下的历史阶段才能有意义。另一方面，从“世界历史性的人”角度来理解“人类命运”。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的宿命论中，“命运”似乎就是一种“偶然性”，人一出生就被抛入了一个特定世界，后期的成长和发展也是受到命运偶然性的钳制。马克思则批评了这种宿命论观点，指出“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20]。随着地域的“民族”被消灭，个人摆脱资产阶级宿命的钳制，单个的人“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1]。在这种认识下，每一个个体的命运便和全球性质的全面的生产联系起来，也即是说个体的人必须打破地域性“民族”的束缚，才能突破传统意义上“命运”的钳制，真正实现个体的解放。

第二，“中华民族”必须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率先感受者。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民族命运与世界各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地域性的“民族”的人将会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历史性”的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构建的现代民族国家不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国家，而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一个互赢、合作、共享的负责任大国。当前，西欧多国极右翼势力进行各种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宣传，推动反移民排外运动，鼓吹民族自决，加剧西欧社会的不稳定性。中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走极端民族主义道路，并以负责任的态度为世界提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和民族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从时间和理论的逻辑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为先行条件，二者是“部分与整体的递进、延伸关系”。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上提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2017年又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并赋予其世界历史性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指的是长期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是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历史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从国内视域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价值在于发展新型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增进中华民族认同。从国际视域看，中华民族共同体超越了传统的民族观念，让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率先感受者。这种感受还必须广泛传递到世界范围内，方具有世界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从四个方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主要包括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和实行多边主义的决心。这“四个决心”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经验，这种经验只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传递，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才可以被称之为普遍的经验^[22]。对此，在2017年2月召开的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标志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广泛的认可，契合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也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验会成为人类的普遍经验。

五、结语

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族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都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点。民族解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而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复兴，才更有底气和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次论述中所透露出对“民族观”的理解，是一个系统的整体设计，遵循着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致思理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

的伟大贡献。管窥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三次顶层设计，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民族解放是反对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既追求制度、形式层面的民族解放，也追求事实、观念层面的民族解放。第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无产阶级组成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人类未来发展方向。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途径，其依托力量是无产阶级组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第三，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民族国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国家，而是爱好和平、互赢共惠、携手共建人类美好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为先行条件，其突出的世界性意义就是为各民族共同发展、化解世界性危机、促进世界文明互鉴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 [1] 马玉欢，张亮.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其当代价值[J]. 学海，2016(4)：5-9.
- [2][3][4][6][12][19][20][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2、41、86、419、419、538、142、541-542.

- [5]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 [7]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71.
- [8] 金炳镐. 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G].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259.
- [9][1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82、148.
- [10] 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M]. 吴睿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
- [11] 张汝伦. 极权主义和政治现代性——读《极权主义的起源》[J]. 现代哲学，2005(4)：6-14.
- [14] 邓小平文集（1949-1974年）：中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46.
- [1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301.
- [16] 库诺. 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M]. 袁志英，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345.
- [17][1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9、45.
- [22] 赵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17-120.

责任编辑：王天海

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话语体系构建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

黄晓妹

摘要: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在本质上是指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思想表达和理论阐释。构建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是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进而加强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基本前提,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作出多维阐释,深刻回答了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何在、优势如何形成、怎么彰显优势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创新了我国政党政治的话语表达,对于解决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构建中仍存在的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传了叫不响等问题,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充分转变为意识形态的话语优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意识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2]这使得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诠释中国崛起的政党制度原因,阐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成为新时代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问题域。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人民政协、统一战线、政治协商、多党合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多维度揭示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内涵,不仅充实、创新了我国政党政治的话语表达,而且对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构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引作用。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的新时代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3]。作为中国原创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不断释放出制度优势,但在理论阐释

收稿日期:2023-09-28

作者简介:黄晓妹,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制度建设、党的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层治理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研究”(2023SJYB218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上长期处于发声不够的窘态，迫切需要构建与其优势发挥相匹配的话语体系。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的有效供给，既能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展示良好的政党形象和国家形象，又能增进新型政党制度的自信和认同，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上一个新台阶。

（一）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内在要求

新时代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是在新发展阶段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建设水平集中标识着政治实践的发展状况，攸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为确保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经受住“四大考验”，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整饬党风，惩治腐败，清除党的肌体中的“毒瘤”，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在政党引领国家发展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与党的建设之间存在紧密关系，直接影响着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质量和水平。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方，能够从内检视问题，通过自我革新和自我净化实现自我提高；各民主党派处于参政方，能够从外透视问题，实现外部提升，“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和谐政党关系有助于各党派“在其位，谋其职”，共同投身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论证说明、充分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合法性、正当性以及这一制度安排的有效性，能够帮助我们党明确自身政治定位，深化对执政使命、责任、宗旨的认识，也有助于提升民主党派参政监督意识，从而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发展。

（二）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和国家形象的战略需要

政党形象和国家形象都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和国家形象，对于推

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正处于战略崛起的中国一直面临政党形象、国家形象被挤压、歪曲、玷污的巨大挑战，这其中有我国政党制度优势话语构建相对滞后方面的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形象与国家形象有着直接的同一体性，政党形象是国家形象的最核心内容和最基本依据。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在重大场合就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发表观点的时候，必须“自觉维护党的威信、维护党中央权威”^[4]，“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5]，从话语的视角对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提出了新要求。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和国家形象，首先需要明确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是什么。构建一套持之有故、言之有物、入脑入心的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以话语艺术精准阐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立场、运作程序和价值旨归，描述中国话语中的政党图像、国家图像，有助于民众理性看待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的成效与不足，扭转国际社会不利舆论风向，消除一些人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误解，更加丰富生动地塑造党和国家的正面形象。

（三）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和认同的客观诉求

制度优势话语体系构建对提升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和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和促进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发展成就和显著优势，目的就是推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制度自信。”^[6]坚定制度自信以认同制度优势为首要前提，没有对制度优势的充分把握和认识，就难以生成真正的制度自信。“语言是促进阶级共识达成的工具。”^[7]构建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对于增进政治信任、促进民族融合、提升国家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还没有被民众广泛了解，一些人因认识不足，掉入西方民主神话的陷

阱，沦为西式民主的拥趸。要以“普遍的、共同的语言”讲清楚中西方政党制度的差异以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哪些方面比西方政党制度更有优势，讲清楚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如何来、有哪些给老百姓带来实在利益，讲清楚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必然随着制度本身的完善充分展现出来，消除民众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疑惑和偏见，为提升政党制度自信和认同提供话语支撑。

（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西方政党塑造的一元化“自由民主”话语世界，及其确立的竞争选举的政治合法性评介标准，垄断了国际民主政治的话语权。但是民主在其实现形式上不该是单一刻板的，而应是丰富多样的，世界上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如果仅用西方价值评价体系来裁剪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与实践，就会得出否定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结论，就会犯颠覆性的错误。社会主义民主在制度程序和民主实践中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来保障真实性、广泛性、有效性的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其提供了制度依据和法理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过多具体阐释，他指出，“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8]，“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就是这种民主最基本的体现”^[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序、繁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推动民主广泛、有效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建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有利于说明中国民主政治的独特发展路径，塑造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观念认识，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

二、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构建的现实图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由谁说、说什

么、为谁说、如何说等重大理论问题，为新时代构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的主体构建

话语主体标识着“说话人”的特定身份及其观察、透析问题的视角。根据话语构建目标的指向、话语受众的辐射范围，以及话语传播效果的“个性化”需求，话语主体的选择应该是多元化、多层次性的。就目前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主体集群建设来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政府，作为最权威的政治话语主体，承担着建设话语体系的主要责任，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有着最高的解释权，这归结于我们党领导人民推动国家建构和治理的历史和实践。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也都“有所作为”，在舆论引导、对外交往中以经验“现身说法”，将自身思想意图、利益诉求等通过话语传递出来。包括各级党校、干部院校，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在内的知识分子，作为学术话语主体，则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以学术探讨、课题研究、基层调研等方式，从理论上解读、说透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了政党研究中心，更注重赋予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一定的科学性，发挥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作用。人民群众作为大众话语的主体，倾向于从“我”的视角出发，对新型政党制度作出“与我相关”的经验评价，建立一种有温度、亲和力强，富有公共性与社会性的话语。总之，不同话语主体借助协调沟通机制合作与互动，发挥着系统、联动的整体性功能，集权威性、学理性、公共性于一体，在多种话语方式的转换中诉说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发挥的“中国故事”。

（二）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的价值构建

价值立场问题是话语体系构建的核心议题。话语背后是价值观，隐含着“为谁发声”的语言

逻辑。中国话语在叙事本质上是为人民群众立言，为中国故事解码，讲究“耕好自己的地”，而不是为资本代言，也不会服膺于西方的逻辑。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推动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决定的。在唯物史观理论视阈中，“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10]。为人民代言、为群众发声的朴素情怀，构成马克思主义最鲜亮的政治底色和最厚重的价值底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体察和关怀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历史命运中概括、总结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新”的方面的优势，指出它“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11]，既是对我国制度优势的“真实面目”的精准阐释和反映，同时也表达了我们党不忘初心、深切关怀国家命运、人民命运的崇高价值追求，显示出对人民立场和人民利益的坚守和巩固。

（三）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的内容构建

伴随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逐渐彰显，作为其理论总结的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在实践中也逐渐充实、丰富和完善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党的领导制度、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制度等制度建设经验，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作出了全面而精准的诠释。习近平总书记从“内生”的视角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2]，基于新旧政党之分，概括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利益代表优势、功能优势和效果优势。他同时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进行论证、阐释，指出这一制度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政治实践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民主理论及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13]，能够聚合社会分散力量从而“为

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并从比较视野出发以“三个有效避免”^[14]概括总结了我国新型政党制的比较优势。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从多个维度阐发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深刻揭示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从哪里来、有哪些、如何转化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夯实了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的内容基础。

（四）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的媒介构建

话语是“一套在一定的历史时空规限下相互联系的思想，它嵌在文本、言词和各种践行之中”^[15]。话语内容的呈现、传播、编辑、反馈等都需要媒介载体来“运作”，依赖于媒介全面、立体地展现其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新时代，党高度重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的媒介构建，包括文本媒介、新闻媒介、网络媒介等。在文本媒介方面，出版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著作文本，也包括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学术专著。新闻媒介是话语表达和传播的重要中介，传统型媒体如电视、广播、电影等在报道领导人活动、党的政策和意图，在展现党和国家的历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新媒体发展日益发挥着放大“话语圈”的功能。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官媒相继开通了微博和抖音账号；学术刊物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如《社会主义研究》杂志近期集中推送解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和效能的文章。通过积极利用、严格监管，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和渠道得到有效利用和开拓，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传播的“时效度”得到保证。

三、构建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面临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6]。我国

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仍面临多重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方政党政治话语霸权的侵袭;二是多元社会思潮的话语阵地争夺;三是政党制度优势理论解释力本身还不充分。

(一)有理说不出:西方政党政治话语霸权的渗透解构意向凸显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垄断了对自由民主概念的定义权、解释权以及评介权,并“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7],造成“似乎只有西方两党轮流执政、多党竞争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才是主导人类民主政治的样板”^[18]的迷惑景象,中国政党制度倒被扣上“非民主型政党”的帽子,被肆意划归为霸权型政党体制^[19]。作为世界话语传播渠道的实际掌控者,西方媒体总是乐此不疲炮制人权、东方威权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等话题,以期论证中国的“政治不正确”。网络空间资本殖民构筑的“核心-边缘”结构更是放大了西方话语的霸权效应,使得部分中国学者丧失判断力和自主性,“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20]。从文化心理学来看,自我贬低、矮化的媚外心理隐喻着“我不如西方”的话语陷阱,强化了西方话语霸权的“外溢”。这些都严重阻滞了各国人民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价值和优势的正确认知,使我国政党制度优势处于“有理说不出”的尴尬境地,陷入被动“他塑”的困境。

(二)说了传不开:融媒体时代多元社会思潮对话语阵地的侵占

伴随以移动网络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多媒体融合发展趋势的加强,话语阵地的“分割”问题日益凸显和复杂起来。一些负面的、消极的、歪曲的非马克思主义、反共产党的社会思潮,在各类媒体平台相互激荡、交锋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挤占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空间,对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构建造成严峻的挑战。据统计,当前西方媒体在国际传播

中仍然占据着主流位置,发达国家提供八成以上重要的国际新闻^[21],西方四大主流通讯社每天的新闻发稿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五分之四^[22]。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传播格局中,西方国家借助影视、博客、慕课、微博、推特等媒体技术,搭乘媒体融合发展的“便车”,把普世价值、拜金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话语植入网络文化,悄然散播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西方思潮。西方国家在鼓吹资本主义制度、多党制的同时,变着花样地唱衰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攻击我国政党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23],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构建产生了强烈冲击。

(三)传开叫不响: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不充分

话语作为一种“精神食粮”,只有与党的建设、国家建设的现实历史相结合,才能有力量,进而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被传唱和叫响。中国政党制度优势话语的创造是伴随着政党制度实践的经验总结逐步丰富、完善起来的,但理论总是滞后的,由于知识体系供给无法跟上政党制度实践的步伐,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传播在一定领域还存在“叫不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多停留于对领导人、中央文件的描述性阐释、政策性解读上,轻政党制度优势本质内容的揭示,学理层面的深度把握和探究稍显不足;二是话语创新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形式大于内容”的情况,理论阐释语言晦涩难懂;三是一些话语阐释没有自觉捕捉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缺少一定“生活气息”,难免远离人民而陷入自说自话的漩涡,成为一种无力的独白;四是政党制度话语表达空泛化、自由化,不讲政治原则,没有政治底线。这些问题不仅无益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的构建,而且还淹没政党制度本身的丰富内容,导致新型政党制度优势隐而不彰,在一定程

度上消解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的完整性、严密性,使其传播力大大降低。

四、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构建路径

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深度参与者,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发挥及成功实践,更是引起全球关注并对世界发展进步作出贡献。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应以中国样本为底板说中国自己的话,以打造主流媒体为依托强化话语阵地建设,以理论创新为推手提升话语软硬实力。

(一)立足中国样本,摆脱西方政党政治话语的路径依赖

在全球化时代里,话语体系构建不可避免遁入“他者语境”,这就要求在与他者交流、对话中首先明确“我是谁”“我为谁”的问题,而不能“人云亦云”,甚至“舍己芸人”^[24],最关键的是要从中国样本出发,在话语主题、话语议程设置上跳出“以西论中”的研究范式,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一是从中国立场、视角解读、阐释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我们用西方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以是否符合西方标准为判断依据,那就只能跟着西方亦步亦趋,永远“挨骂”^[25]。为资本立言的西方政党政治话语,不能用来分析、指导我国政党制度建设,要超越西方单极思维、普世思维的桎梏,“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摒弃不科学、不适用的话语”^[26]。二是从中国问题着手,研究和总结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的经验,提升知识性政党制度优势话语的生产能力。“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27]。要善于在“探索中国”中寻找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挖掘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构建的新的增长点。三是牢牢把握“两个结合”,立足中国实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提炼出具有典型性、标志性、代表性的概念,打造易于被人民群众所熟记、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符号

和新概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中国风格的语言形式、阐释体系和叙事框架。

(二)打造主流媒体,基于媒介融合发展强化话语阵地建设

话语传播掌握着话语体系构建的喉舌。基于融媒体发展的大宣传体系,是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的基本载体。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时代,媒介形态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融合,形成了全方位多面向话语传播的矩阵合力。构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必须充分考量媒介形态走向融合发展的这一显著特征,推动政党制度优势话语在不同媒介平台的表达与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如果我们不主动去占领思想阵地,思想阵地就可能被别人占领,这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极端危险的。必须加大力气推动主流媒体建设,打造一批国际影响力大、信誉度高的主流媒体,发挥主流媒体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作用,抢占话语市场。面对跨媒介融合发展形成的多平台话语传播场域,要及时转变传播理念,善于塑造仪式情景,同时树立传播权威,提升议程设置和阐释的主动权,以此为基础推动立体的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阐释、传播体系的建立,将宏大理论叙事与细碎微观叙事有机结合起来,以适应新旧媒体融合发展,强化话语高地建设,增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的辐射范围。

(三)推动理论创新,促进硬实力与话语软实力的深度提升

话语软实力和硬实力深度提升是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提升的重要保障,也是新时代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马克思认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发和发挥”^[28]。话语在归类上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作为现实存在的意识,它

是由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话语。只有“思想和现实始终保持一致”的话语创造,才具有说服力和阐释力,才能始终“叫得响”。政党制度优势话语构建的根基在于政党制度实践。政党制度理论创新必须关照现实,去除“空想”“空谈”的部分,做到有理有据,坚持话语创制与话语现实相统一的原则。西方政党政治话语之所以长期坐拥“霸主”席位,除了少有的真道理以外,更多是因为拥有过硬的实力,随着其实力的下滑,政党政治话语的效力也将逐步降低。新时代构建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话语体系,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义上展开,既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原初语境,从学理上深入揭示、论证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何具有显著优势,同时也要全面、充分、准确地反映和概括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发挥在新时代实践中的表现及其内在机理。更为重要的是,要以政党制度理论创新推动政党制度创新,不断促进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以弥合政党制度实践上的显著优势与政党制度理论话语缺位之间的裂隙。

参考文献:

- [1][6] 习近平.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B/OL]. (2020-01-01).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1/01/c_1125402833.htm.
- [2]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8.
- [3][23][24]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97-198、27、203.
- [4][2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159-160、327.
- [5]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 [7] 艾夫斯·葛兰西: 语言与霸权 [M]. 李永虎, 王宗军,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4.
- [8] 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 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N]. 人民日报, 2014-09-22(1).
- [9][11][14]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 [N]. 人民日报, 2018-03-05(1)、(1)、(1).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95-196.
- [12] 奋力书写人民政协事业新篇章 [N]. 人民日报, 2019-09-20(2).
- [13] 刘诚, 朱益飞. 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特色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3(2): 26.
- [15] 麦克洛斯基. 社会科学的措辞 [M]. 许宝强, 刘健芝, 罗永生, 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78.
- [16]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05-19(2).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80.
- [18] 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专家学者聚焦如何建立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 [N]. 团结报, 2016-08-11(1).
- [19] 萨托利. 政党与政党体制 [M]. 王明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305.
- [20] 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8.
- [21] 张书林. 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国际化的路向选择 [J]. 理论学刊, 2020(4): 42.
- [22] 梁凯音. 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9(3): 112.
- [26] 姚桓. 构建中国执政党理论的话语体系 [N]. 光明日报, 2012-10-31(12).
-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525.
-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七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433.

责任编辑: 王天海

新时代数字海外统战工作能力建设探析

翟 阔 金 新

摘要:新时代以来,统战部门积极推动海外统战工作数字化发展,工作中统战思维的数字化变革、统战机制的数字化重塑以及统战载体的数字化赋能等特点凸显。数字海外统战工作能力建设在各个层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思想认知偏差和理论研究短板对海外统战“数智”思维的支撑有限;不平衡不充分工作机制与海外统战“数治”体系存在耦合矛盾;资源供给不足和功能设计短板限制海外统战数字平台的赋能效果。为更好地建设数字海外统战工作能力,需要加强以“数智”思维为蓝图的思想引领和理论研究,健全以“数治”体系为范式的协同性工作机制,完善以数字赋能为基点的一体化平台建设,从而推动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构建,凝聚海内外爱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关键词:数字技术;统战工作能力建设;大统战工作格局;海外统战工作

当前,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给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带来新的契机。数字海外统战工作是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总结新时代数字海外统战工作的特点,分析当前数字海外统战工作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探究未来采用何种策略提升数字海外统战工作能力,对于推动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数字海外统战工作的特点

数字海外统战工作是数字统战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指统筹运用数字化思维、数字化机制、数字化平台,实现海外统战工作的智慧化、信息化管理和运行,创造出与海外华侨华人适应性更强、匹配度更高的统战载体和统战方式,以更好地增进侨胞认同,凝聚侨胞共识。数字海外统战工作能力是党委及统战部门等海外统战工作主体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在深刻理解数字时代社会变革趋势的基础上,开展数字海外统战工作所具备的知识、技能等综合力量的统称。

(一) 统战思维的数字化变革

在新的发展阶段,数字海外统战工作不仅是

收稿日期:2023-08-20

作者简介:翟阔,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金新,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强化开放意识,推动陕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研究”(2023LS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技术上的变革,更体现为思维上的变革,这是有序推进海外统战工作的先导。统战思维的数字化变革是指通过提升党委及统战部门等责任主体对数字海外统战工作的重视程度和认知水平,使其在海外统战工作中树立数字意识、通晓数字理念、内化数字认知,达到“知数、信数、懂数、用数”的“数智”状态。数字化统战思维核心在于坚持“系统集成、数字赋能、迭代升级”基本方法理念,追求统战工作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精准化、动态化蝶变^[1]。新时代以来,各级统战部门不断推进海外统战工作的数字化变革,提升统战干部的数字素养,统战思维的数字化变革初见雏形。

首先,党的领导是统战思维数字化变革的根本保证。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其中指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之一,是“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2]。数字海外统战工作正是在数字治理新格局下对海外统战工作进行改革创新的产物,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海外爱国力量建设,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要做好网络统战工作,走好网络群众路线。”^[3]这为海外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指导,数字海外统战工作正是把“加强海外爱国力量建设”和“做好网络统战工作”相结合的有益尝试。

其次,统战部门的政策规划是统战思维数字化变革的重要依据,科学的方案规划助力实现工作理念数字化的精准转向。例如,2020年12月,浙江省侨办、省委改革办、省大数据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浙江省为侨服务“全球通”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从六个方面提出了浙江为侨服务“全球通”平台建设的具体举措,着力构建内外协调、便捷高效、合法合规、安全可靠的跨境为侨服务体系^[4],为深入推进浙江的数字海外统战工作提供了科学方案。2021年12月,四

川省委统战部正式印发实施《四川数字统战建设“十四五”规划》,这是四川统一战线发展中出台的第一份关于统一战线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文件,为开展数字统战工作提供了指导。

最后,统战干部的数字素养是统战思维数字化变革的关键支撑。许多基层统战部门把数字技术、网络安全等列入干部教育重要内容,通过组织专题培训班、开展专题座谈会等方式不断强化统战干部的数字认知。

(二) 统战工作机制的数字化重塑

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重大的国家战略与时代主题。统战工作机制的数字化重塑是指通过构建数字技术驱动的统战工作新机制,建立起精准高效、智慧联动的工作制度体系,实现统战部门之间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和协同治理,营造用数据对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服务、用数据创新的现代化“数治”统战模式。新时代以来,为更好地推进海外统战工作,统战部门构建了多类型云端侨务工作机制,并推动传统侨务治理模式深化改革,提高治理效能,不断推进统战工作机制的数字化重塑和统战工作“数治”体系的形成。

一方面,多类型云端侨务工作机制的建设是海外统战工作机制数字化重塑的创新举措,有效维持了统战工作的开放化运转。在为侨法律服务上,部分地区设立了涉侨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免除了侨胞们维权手续繁、成本高的后顾之忧。例如,浙江省青田县率先开设了网络视频庭审,通过制定涉侨网络诉讼规则,推动涉侨纠纷在线化解^[5]。广东省江门市建立便利华侨华人投资税收服务中心和服务平台,以“线上线下、优势互补”的模式在办税服务指引、涉税业务咨询办理等方面为侨企侨胞提供“线上+线下”多语种服务,满足了侨企侨胞的多元需求^[6]。

另一方面,侨务治理模式的智能化、网络化改革是海外统战工作机制数字化重塑的关键环节。例如,浙江省青田县创新推进“数智侨务”

建设,通过整合县域内为侨服务平台和资源,进行场景设计和应用开发,将需要跑多个部门、提交多份材料的事项“并联”为一件事,实现司法服务“一呼即应”、双创服务“一库推荐”、社会服务“一网联动”,不断提升为侨服务实效^[7]。

(三) 统战载体的数字化赋能

统战载体是数字海外统战工作开展的重要依托。统战载体的数字化赋能是指以在线化、平台化、集约化、网格化、智慧化为导向,探索建立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区块链及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多维多级多功能智能平台^[8],以此为统战载体,赋能统战工作,提升工作决策的精准性和科学性,从而与侨胞开展精准化合作,为侨胞提供全过程服务,与侨胞实现多形式沟通,不断提升侨胞认同感。新时代,各级统战部门将数字技术创新运用于海外统战的具体工作中,推出了一系列数字侨务工作载体,如数字信息平台、数字服务平台和数字媒体平台,这些载体的运作提升了海外统战工作的实践成效。

首先,侨情调查和动态分析是海外统战的基础性工作,侨情数据库等数字信息平台的推出为侨情分析提供了科学依据。例如,浙江省以海外侨情为基础,建设“精细版”海外侨情信息“智慧之库”。其中,湖州市吴兴区利用大数据比对技术,完善“一库一表”“涉侨重点人士、侨港澳资企业”等侨情数据库,精准掌握海外侨胞和涉侨群体分布情况,展现出一幅翔实的“侨情地图”,夯实了侨情基础^[9]。杭州市上城区侨联不断创新载体,运用数字化技术,延伸侨联工作触角,打造“数字侨联”线上平台,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设侨情登记链接,运用数字侨联的大数据分析,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侨界人士关注多、呼声高、需求大的活动^[10]。

其次,与华人华侨开展各种形式的联谊合作是为侨服务、凝聚侨心的重要方式,数字服务平台以独特便利的功能创新了联谊合作的方式方法。例如,2022年4月,由中国新闻网、中国侨

网联合全球华文新媒体共同推出的同心战“疫”信息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同心战“疫”平台汇集新闻报道、信息服务、问答咨询等多项功能,设有疫情速递、防控动态、医疗咨询等版块,为海外华侨华人、中国留学生等及时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和心理健康疏导^[11]。

最后,数字媒体平台以新颖性、便利化的特点丰富外宣形式,营造了数字海外统战工作的良好舆论氛围。新时代以来,面对西方国家“统战干涉论”的攻击,我国驻外大使、外交部发言人、媒体记者等利用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开展新闻发布、疫情科普等工作,对破除西方国家的舆论漩涡,争取侨心、凝聚侨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统战部门已经形成了“门户网站+侨报侨刊+中国侨网+‘两微一端’+抖音”等媒体互联、互嵌、互通的传播格局。数字媒体平台对海外侨胞的沟通交流、倡议动员、新闻传播以及舆论引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新时代数字海外统战工作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

新时代各级统战部门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和工作实践,推动我国数字海外统战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我国数字海外统战工作能力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一些内外因素的干扰下,统战思维、机制和载体等层面仍存在不足。

(一) 思想认知偏差和理论研究短板对树立海外统战工作“数智”思维不利

一是部分统战干部对相关工作的理解不到位。如数字海外统战工作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对海外侨胞开展网络统战工作,而一些统战干部对网络统战工作的实质要求、工作对象、方式方法等基本知识把握不够清晰,将网络统战工作看成统战部门的门户网站建设、办公信息化建设,视为网络与统战工作的简单叠加。统战干部对数字技术的重视程度不足,缺少网络运营、媒体宣传、信息传播等数字时代所需的专业技能训练,对数字海外统战工作的具体操作把

握不到位。

二是数字海外统战工作缺乏成熟的理论研究和前瞻性研究成果。近年来,关于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热度不断攀升,统战话语体系构建初见雏形。目前,数字统战工作这一主题也日益得到关注,对数字统战工作的作用、问题与优化路径方面的研究日益丰富,但整体而言仍处于起步阶段,“数字统战工作”这一概念尚未取得明确共识^[12],对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字海外统战工作”更是缺少深入研究。统战话语体系的构建是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交替前进的结果^[13]。理论研究与创新可以为统战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但目前对数字海外统战工作的基本内涵、实践经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亟待深化,尚不能为实践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持。

(二)不平衡不充分的工作机制影响海外统战工作“数治”体系的构建

数字海外统战工作的制度建设仍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面临着许多制约其发展的因素,离构建统战工作“数治”体系的目标仍有差距。

一是云端工作机制不健全。首先,“有发展而无制度”是一些地方数字海外统战工作的现实反映。各地统战网站、手机应用程序等网络资源平台建设缺乏宏观规划和统一标准,多网并存、重复建设,相关资源无法共享,难以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互联互通的大网络^[14]。其次,平台运行不充分,缺乏配套服务机制。最后,工作保障不到位,缺乏协调监管机制。数字海外统战工作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工作效能,但操作不当也会导致信息泄露、系统崩坏等技术风险,而相关保障性法规制度体系尚未形成,相关监管机制仍待完善。

二是尚未形成高效联动。加强统战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及工作各个环节的协调配合,推动建立更加高效的数字海外统战工作格局,是开创数字海外统战工作新局面的重要目标。然而,当前多元统战主体协同统筹推进数字海外统战工作存

在“中梗阻”现象,协同联动、系统高效的云端管理格局尚未形成。一些统战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信息共享不足,未能形成高效联动。虽然统战部门积极拓展云端业务,业务管理取得良好成效,但各部门间仍一定程度存在业务交叉和信息不畅,给办理业务的海外侨胞带来麻烦,影响统战工作效能。

此外,统战部门需要那些既拥有统战理论知识与业务技能,又掌握大数据知识与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但目前统战部门复合型人才相对缺乏,影响数字海外统战工作成效。

(三)资源供给不足和功能设计短板限制海外统战数字平台的使用效果

数字侨务产品等载体平台的应用简化了海外统战工作的程序,提升了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但目前统战工作载体的应用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工作效能的提升。

一是数字基建水平仍有待提高。首先,对数字基建的投入有限,缺资金、缺人才的现象在基层统战部门依然存在,尤其是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层统战部门,在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上投入更加不足,缺乏完善配套的资金扶持政策。其次,我国数字化建设整体应用水平还不高,数字统战工作载体研发和推出的进程不同步。许多省市重视开展智慧统战建设,开通了微博、微信等端口,但整体来看还存在断层问题^[15]。最后,一些部门对数字统战工作载体的维护意识不强。例如,侨情数据库的应用提升了侨情分析的精准性,但许多基层统战部门不重视数据库的及时更新,侨情调查工作仍存在漏点、盲点。

二是部分数字服务平台的运行存在功能设计不全面、服务不到位的情况。一方面,平台页面内容不够丰富,产品设计缺乏吸引力。许多基层统战部门微信公众号重形式轻内容,存在内容偏少、更新缓慢、原创性不足等问题。手机客户端和网站平台设计不够精良,难以吸引侨胞“粉丝”。另一方面,部分数字平台功能单一、交互性弱。

部分基层统战部门没有把数字平台当作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媒介，而是当成单位发布各种政策文件、宣传上级指示的传声筒。一些公众号偶尔转发一些全国统战工作的会议精神、新闻动态，很少反映本地区统战工作的具体情况；一些平台只有信息发布功能而没有开发信息沟通功能，许多网站缺乏吸引力。

三是统战话语在数字空间的传播效能仍需提升。首先，海量信息和各种思想观点在互联网空间激烈碰撞，易对统战工作对象形成误导。其次，话语内容和表达尚未适应数字化时代统战工作对象的需求。部分统战干部在数字平台上与华侨华人沟通时语言不接地气，不善于运用鲜活生动的“网言网语”，效果不够理想。最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不够。相比新媒体而言，老一辈华侨华人更愿意接触传统媒体。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数字海外统战工作如何提升话语传播效能仍是一个难题。

三、新时代加强数字海外统战工作能力建设的对策

（一）加强以“数智”思维为目标的思想引领和理论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谈及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时指出，要“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6]。加强以“数智”思维为目标的思想引领和理论研究，是数字海外统战工作极为紧迫的发展命题。

一是加强思想引领，丰富培训方式。首先，突出数字理念的引领。统战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将数字理念融入日常管理、队伍建设和宣传教育等方方面面。其次，丰富教育培训方式。要对统战干部教育培训的方式进行创新，不仅运用理论培训班、思想座谈会等形式开展专题培训，还要通过场景应用参观、技术产品实操等多元方式增强培训的吸引力。最后，以跨领域培养的方式，提升统战干部队伍的数字技术

水平。

二是推进理论研究，强化智力支撑。一方面，需从相关政策阐释和具体工作实践中总结经验、提炼观点。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通过调查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了解情况、把握动态、找准问题，在数字海外统战工作的具体实践中总结经验，为理论研究提供现实参考和依据。另一方面，要注重理论探索，推动理论创新。以探索提炼数字海外统战工作的基本规律为主要研究思路，对其工作本质、原则、意义等进行全面探索，在其他统战工作领域现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创新研究。注重理论借鉴，可借鉴数字治理、网络传播等比较成熟的理论，不断提升数字海外统战工作理论研究水平。此外，理论建设要契合时代发展潮流，主动适应数字技术发展新态势，提升理论的实践应用价值。

（二）健全以“数治”体系为范式的协同工作机制

统战部门应重视完善数字海外统战工作的制度建设，进行前瞻性规划，构建以“数治”体系为范式的协同工作机制，激发制度活力，更好地提升统战工作的治理效能。

一是建立健全数字海外统战工作管理体制机制，为统战工作提供可靠保障。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内容完善、形式完备、运行高效的工作制度规范，使各地数字平台的建设有制度可依，各级数字海外统战工作的开展有规范可循。完善配套服务机制，为机制平稳运行提供保障。全面梳理涉侨行政审批事项，争取各类侨务事项都能纳入服务窗口办理，对办理事务尽可能一次性告知，列明办理事项的基本流程，提供各类涉侨问题问答手册，为侨胞提供多元参与渠道。建立协调监管机制，重视数字安全工作。加强立法执法，探索保障性法规制度，重要业务和活动可适当采用网络加密，防范泄密风险。

二是实现海外统战工作各部门间的协同联

动,优化管理服务。以“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指引,统筹协调好相关部门间职责功能,建立统战部门主导、多部门协助的工作信息平台建设和运行模式。优化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完善侨务公共服务体系。相关部门需深入互联网平台调研,并与公安部门、网络公司等建立协作互通机制,推动省、市、县三级侨务云端管理平台间以及不同地区管理平台间对接贯通,打破属地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信息资源共享和完整的业务跨地区办理,消除信息发布混乱、业务办理重复等现象。改革传统的业务管理模式,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协同管理模式。统战部门要依托数字平台优势,破解行政机制程序的滞后惯性阻碍,通过线上交流,培训有影响力的代表人士,再通过代表人士团结引领所联系的成员和群众,形成线上线下统战工作合力。

三是加强数字海外统战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组建专业化统战队伍。整合人才资源,优化人才配置,建立人才智库,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同时,激发华侨华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热情和投身海外统战工作的积极性。

(三)完善以数字赋能为基点的一体化平台建设

加强数字海外统战工作能力建设,需不断完善以数字赋能为基点的一体化平台建设,既加强数字侨务产品研发与应用,又优化数字平台的功能服务,积极推进数字平台上的话语传播,合力推动构建数字时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一是加强数字侨务产品研发应用,做好统战工作载体的安全维护。数字侨务产品在海外统战工作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侨务产品研发提供技术保障。首先,增加数字侨务产品研发和维护的资金投入。各级统战部门需要加强项目建设、运行维护等方面的预算保障,推进经费规范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各类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经费支持,

保证数字侨务产品研发既见投入又见实效。其次,持续创新数字技术,推动高质量数字化应用建设,构建统战数字全景场域。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构建数字信息联系网,实现技术共享,充分发挥大数据的智能分析功能,共同推进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数字化应用建设,推出更多如“华侨通”“浙侨通”等为侨服务的特色技术产品。最后,增强维护意识,实现最佳效能。注重对各类侨务产品和数字基础设施的维护,制定维护方案和应急预案,健全各类侨务产品功能。可建立全面分析、综合研判、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数据库管理制度,开展科学、统一、精准的统战政策执行评估反馈、分析评价与督导考核工作,实现侨情数据的动态更新。

二是优化数字平台功能服务,畅通平台建言咨政渠道。数字平台提供的功能服务要以人为本,注重用户体验,树立尊重侨胞、关心侨胞、服务侨胞的工作原则,依靠广大侨胞合力助推数字海外统战工作的平稳运行。一方面,全面优化产品页面设计,增强对侨胞“粉丝”的吸引力。在网页设计上,调整设计思维,将门户网站打造成对外展示统战工作的名片。另一方面,大力拓展产品功能服务,增强平台互动性。数字平台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发表文件和传达指示,更需发挥出联谊交友、凝聚共识的作用。无论是网站平台还是移动客户端,均需开发政策解读、意见互动版块以加强互动交流,保证海外侨胞政策咨询、意见表达和建言献策的渠道畅通。

三是提升数字媒体平台传播效力,扩大政策宣传和话语表达影响力。统战部门要广泛凝聚侨胞共识,需以数字媒体为基础搭建开放性的大统战工作框架^[17],发挥数字媒体平台话语传播最大效能。首先,需把握舆论全局,加大主流媒体传播引领力度。面对数字空间中的多元思潮,要正确引导舆论,防范网络乱象。主流媒体要积极转型,在数字平台上灵活开展宣传,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侨胞对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其次,推进话语

内容转换和改进话语表达。创新数字媒体平台宣传的方式方法,打造融通中外的数字海外统战话语体系和海外统战宣传工作品牌,运用海外华侨华人喜闻乐见的网络化、国际化的文风做好统战宣传工作。

参考文献:

- [1] 刘燕珂. 系统论视域下数字统战的构成要素与创新策略研究——基于浙江省衢州市的实践考察 [J]. 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2): 27-33.
- [2]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EB/OL]. (2021-01-05).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1/05/content_5577289.htm.
- [3][16]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N]. 人民日报, 2022-07-31(1)、(1).
- [4] 省委统战部(省侨办)、省委改革办、省大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浙江省为侨服务“全球通”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EB/OL]. (2020-12-10). http://www.qxzh.zj.cn/art/2020/12/10/art_1229430981_58902970.html.
- [5] 侨胞们, 别来回跑啦! 这些业务都能线上办! [EB/OL]. (2020-11-10). <http://www.chinaqw.com/hdfw/2020/11-10/275749.shtml>.
- [6] 我市便利华侨华人投资税收服务中心揭牌成立 [EB/OL]. (2022-08-15).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jmsw_yhyshj_zxdt/2022-08/15/content_6611ac9e21994be5844902bfc2ee22cc.shtml.
- [7] 青田县创新推进“数智侨务”建设 加快构建侨务工作整体智治体系 [EB/OL]. (2021-07-02). <http://www.zjsql.com.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3&id=50583>.
- [8] 唐良虎, 李彦晶. 大数据赋能高校统战工作: 意蕴、场景及路径 [J].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3): 13-26.
- [9] 湖州市吴兴区驱动数字侨联新引擎 [EB/OL]. (2021-12-09). http://www.qxzh.zj.cn/art/2021/12/9/art_1229553699_58910226.html.
- [10] 杭州上城区打造“三大平台”提升为侨服务效能 [EB/OL]. (2021-07-30). <http://www.zyztb.gov.cn/wqfw/358224.jhtml>.
- [11] 全球华文新媒体同心战“疫”信息服务平台上线 [EB/OL]. (2020-04-02). <https://www.chinanews.com.cn/hr/2020/04-02/9145460.shtml>.
- [12] 王梦滢, 文字杰. 数字技术赋能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研究 [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3): 84-89.
- [13] 张超, 曹文宏. 中共统战话语体系的百年演进及其内在逻辑 [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15-24.
- [14] 侯天佐. “互联网+”背景下网络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研究 [J]. 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 2018(1): 30-36.
- [15] 常庆林. 数字化建设嵌入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路径研究 [J].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2): 86-92.
- [17] 谢静. 数字统战与城市治理现代化——上海的实践与经验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4): 31-37.

责任编辑: 宋好

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驱动因素、 潜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李兰翔 丁永坚 卢文俊

摘要:民营企业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江苏民营企业在助推乡村振兴方面呈现数量规模全面增长、分布结构相对聚焦、产业要素流动加快等鲜明特征。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来自政策叠加、资本收益变化、市场竞争需求、社会责任意识强化等因素的驱动。同时,民营企业在促进乡村振兴效果上还存在着利益联结不够紧密、要素支撑亟待优化、赢利增长放缓等短板。下一步,需要从加强镇村一体规划、提升配套服务功能、坚持产业振兴导向、提高金融普惠水平、密切村企利益联结、强化社会责任引领等方面入手,引导民营企业为乡村振兴作出新贡献。

关键词:民营企业;乡村振兴;万企兴万村

近年来,江苏民营企业响应党中央关于做好“三农”工作的系列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要求,在完成“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的基础上,积极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总结江苏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特点,分析背后的原因与经验、风险与问题,对进一步动员江苏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意见建议,省工商联聚焦“万企兴万村”行动,采取省市联动、部门联合、线上问卷与走访座谈

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开展江苏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专题调研。调研总计走访民营企业140家,与省内各设区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等部门联合召开座谈会15场,线上收集有效问卷383份。在对相关数据、案例与需求分析的基础上,省工商联结合相关工作,以国家、省相关部门公开发布的宏观数据、相关文献为补充,分析了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驱动因素,探讨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一、民营企业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2021年,全国工商联、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光彩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

收稿日期:2023-10-03

作者简介:李兰翔,盐城市副市长;丁永坚,江苏省工商联经济处处长;卢文俊,江苏省工商联经济处一级主任科员。

国农业银行联合启动了“万企兴万村”行动，这是对“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的有序衔接。行动启动后，省工商联、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省光彩会、省农发行、省农行成立行动领导小组，组织民营企业广泛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民营企业业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一）帮扶成果得到巩固拓展

调研显示，79.73%参与扶贫的企业参与了“万企兴万村”行动，发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作用。“企业+订单+合作社(农户)”“电商+农户”等行之有效的帮扶模式在行动中延续。金浦集团的现代化育种猪场、君乐宝乳业的现代化奶场、万顺集团的下党定制茶园等投资项目，带动了一方产业发展。据不完全统计，金色庄园、诺亚方舟等 17 家企业已发展为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基地，天环食品、葡之源农业、茅山人家等 569 家企业成长为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有效发挥着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

（二）数量规模实现全面增长

“十三五”时期，在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启动后，省工商联就组织民营企业开展“百企帮百村”扶贫活动，推动企业由以往的自发零星参与转变为有组织广泛参与，数量规模由扶贫活动初的 100 家增长为目前近 8400 家。从类型上看，大中小企业广泛参与，中小企业占

比 73.96%。从行业上看，国民经济 18 个行业门类均有分布。问卷调查显示，参与调研企业投资额实现翻三番，由扶贫活动初的 6.43 亿元增长到现在的 19.94 亿元。

（三）分布结构呈现相对聚焦

问卷调查显示，制造业、农林牧渔业、批发与零售业、建筑业、住宿与餐饮业领域中的民营企业最为活跃，占比达到 97.70%。在地区分布上，在苏北、苏南、苏中企业数各有增长的同时，参与苏北地区乡村振兴的企业数占全省企业数的 51.90%，项目数占全省项目的 58.30%。在投资领域分布上，各有侧重，相对聚焦。以企业投资领域与国家鼓励目录匹配情况为例，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的匹配度高于制造业，益客集团、黎明食品等企业聚焦精深加工、循环绿色农业做文章，在当地带动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见表 1）。

（四）产业要素流动明显加快

在资金上，企业涉农投资不断增长，带动涉农融资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截至 2023 年 9 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6.30%，比 2022 年上升 3.8 个百分点，高于同期人民币贷款增速 1.5 个百分点。在技术上，南京卫岗、乾宝牧业等 21 家民营企业成为全省振兴种业“揭榜挂帅”项目单位。在服务上，以服务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最为突出。汇通达、食行生鲜、味好果园、

表 1 部分行业投资与国家鼓励目录匹配情况

	现代种养业	现代种业	乡村富民产业	农产品加工流通业	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农业科技创新	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建设
农林牧渔业	71.01%	39.13%	25.36%	31.16%	15.22%	18.84%	17.97%
制造业	17.31%	1.92%	16.67%	10.46%	4.49%	8.26%	5.77%
批发和零售业	27.50%	10.00%	37.50%	30.00%	7.50%	10.00%	2.50%
建筑业	16.00%	0.00%	4.00%	0.00%	24.00%	4.00%	4.00%
住宿和餐饮业	42.86%	14.29%	38.10%	33.33%	14.29%	9.52%	0.00%

瑞祥科技等一批平台企业、渠道管理企业积极发挥优势，赋能乡村产业发展（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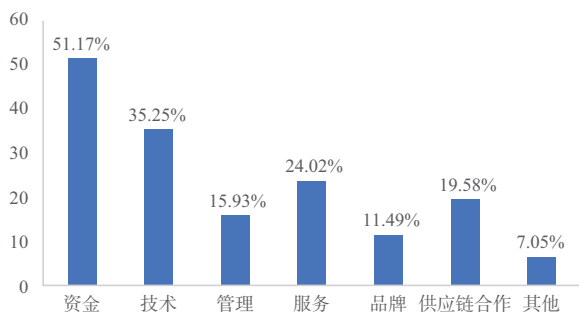


图1 企业带动生产要素下乡占比情况

二、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驱动因素

（一）政策叠加供给形成制度激励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要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带来了营商环境政策与乡村产业政策叠加供给。在营商环境上，2016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累计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措施62项，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分析省内各设区市营商环境满意度与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积极性的相关性，总体呈现较强的正相关。问卷调查显示，认为项目地基础设施、自然资源、政策环境较好以上的企业占比分别达到82.77%、88.51%、82.51%。

在乡村产业上，2017年以来，全省相继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整省试点任务，制定出台各类助农惠农政策111项，为企业走向乡村提供了空间。调研显示，92.69%的问卷企业表示政策调整带来乡村红利释放，其中自然资源、原料产地、区位交通位列前三。

（二）资本收益变化促进下乡投资

纵观近10年来乡村人均产出与资本存量变化，及服务乡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情况，乡村资本存量和投资收益增长总体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由此带来城乡资本收益增长差距不断缩小。这极大地提升了企业下乡投资的信心。问卷调查显示，2000年以来，企业下乡投资呈倍数增长，2011年至2020年增加了196家。53.52%的问卷企业表示在未来三年有扩大投资规模的意愿。

（三）市场竞争需求牵引布局乡村

随着宏观经济周期变化和市场细分发展，乡村作为原料、半成品的重要来源地和产品消费市场，已成为企业布局的重要方向。问卷显示，大多数企业紧扣主业投资乡村，85.71%的工业企业投身乡村制造业，打造原料采购加工基地、区域产品产销基地；86.90%的农业企业选择农林牧渔业，发展现代种养殖业、现代种业，打造农特产品初精深加工基地（见表2）。

（四）社会责任意识推动回报家乡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工作。近年来，省工商联积极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要求，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2016年以来，省工商联以建立“江苏民营企业乡村振兴基金”“江苏光彩事业教育基地”为牵引，通过举办培训班和企业座谈会、开展主题党日等举措，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弘扬光彩精神，主动回报家乡。在“万企兴万村”行动中，44.70%的项目属于企业回报家乡。问卷调查显示，25.00%的项目由返乡人员创办，58.00%的项目负责人户籍在当地。开展助学、结对党建、捐建图书馆和

表2 民营企业投资乡村行业情况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工业企业	3(3.30%)	0(0.00%)	78(85.71%)	0(0.00%)	2(2.20%)	1(1.10%)	2(2.20%)
农业企业	80(86.96%)	0(0.00%)	12(13.04%)	0(0.00%)	12(13.04%)	1(1.09%)	5(5.43%)

养老院，帮助修路修桥等成为民营企业回报家乡的重要形式。

三、影响民营企业振兴乡村的潜在因素

（一）利益联结不够紧密

主要表现为“三低”。一是合作合股经营占比低。目前收益分配主要以支付劳务工资、消费采购费、土地流转费、厂房设备租赁费等方式为主，组织小农户按标准经营、培育新型主体开展规模经营、村集体“经营权”入股等合作合股经营的方式相对较少。二是帮助村民就近解决就业占比低。随着“合村并居”建设的推进，就近解决集中居住农户，特别是“上楼”农户就业的需求增加，但企业帮助村民就近解决就业占比低。问卷显示，56.00%的企业距离农民集中居住区较远，无法就近提供就业岗位。三是直接落实到村集体土地的投资占比低。调研显示，直接落实到村集体土地的投资额占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企业投资总额的28.60%。

（二）要素支撑还需优化

一是土地供需匹配有短板。具体表现为土地调整调剂难、荒地开发的配套设施建设难、已登记为其他经营实体所用的土地在该实体清算后转化利用难等问题。问卷显示，37.66%的企业表示用地困难，还有13.99%的企业表示规划调整未及时调剂土地。二是普惠金融助企惠农有差距。依然存在基础金融产品可得性不够、有效抵押不足、贴（免）息和保险覆盖范围窄等痛点。问卷显示，39.95%的企业表示融资困难。三是留乡人口支持企业长远发展有不足。城镇化发展和土地规模化流转开发，使劳动力持续转移，留乡人口年龄偏高；同时，出现乡村“周末节日热闹闹，平时空荡荡”的现象，导致现有乡村人口以及由此形成的消费市场无法支撑企业长远发展。问卷显示，37.40%的企业表示用工困难，40.46%的企业表示缺乏技术人才。

（三）盈利增长略显放缓

调研显示，50.91%的企业表示投资未达到预

期。问卷对比2021年与2020年营收与净利润变化，在利润增长企业中，净利润增加要比营收增加低3个百分点；在利润减少企业中，净利润减少要比营收减少多3个百分点。有的企业表示涉农产业需要其他产业利润来支撑。有的企业表示项目补贴之年能实现收支持平，没有补贴就亏本。

四、引导民营企业更好参与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落实好党的二十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擘画的乡村振兴宏伟蓝图和作出的决策部署，需要固强补弱，综合施策，积极推动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为乡村振兴作出新贡献。

（一）加强镇村一体规划

发挥规划的牵引与管理作用，以县域为单位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与产业规划，创新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由县城牵引，以镇为中心，镇、行政村、自然村功能定位明确，产业梯度配合、分工明显的空间格局。围绕国家鼓励目录建立企业参与镇村建设准入标准、负面清单，明确管理规范，拓展企业投身乡村建设领域。发挥重大产业项目辐射带动功能，在满足乡村规划和环保前提下，推动项目在城镇开发边界或园区外灵活组合搭配地块，形成点面结合布局，提高对村集体土地的直接投资水平。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乡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保障农村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农业产业化发展需求。

（二）提升配套服务功能

抓实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组织引导企业通过投资、捐赠等形式，积极参与村内道路、小型防汛抗旱供水、分布式清洁能源等设施的建设和管护，缩小城乡差距，满足企业用水用电、交通物流等经营需求。拓展乡村便民服务中心或党群工作中心功能，将相关部门服务企业活动融入其中，打造更多常驻化、流动化助企平台。着眼乡村企业中小型居多的实际，加强企业走访调研和政策宣传解读，充分听取企业需求，精准用好政策帮助企业降压减负，为企业轻装上阵提供更多的营商

便利。

（三）坚持产业振兴导向

聚焦农产品加工业、乡村特色产业、乡村休闲旅游业和新型服务业，加强政策、市场等各类措施的综合集成，推动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农村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农业产业化发展。聚焦产业技术，提升关键环节和瓶颈制约，帮助建好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心，推动企业与科研院所联合攻关。推动企业积极参与区域公用品牌、绿色品牌和非遗品牌培育，创响乡土品牌，提升乡村产品溢价。推动企业用好乡村特色生态资源，发展田园观光、健康养生等业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和现代流通业，活跃乡村消费市场。引导企业依托兴村项目建设实训岗位和人才孵化基地，带动当地群众创办家庭农场、合作社，助力农村“新农人”群体壮大。

（四）提高金融普惠水平

发挥好省乡村振兴基金和政策性乡村开发金融工具的龙头带动作用，集聚社会资本推动“基础设施下乡”。针对农业企业、中小企业抵押不足的实际，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推动金融服务向重合同守信用兴村企业倾斜，加快风险补偿和贷款担保联动。拓展“小微创业贷”“苏科贷”“苏农贷”“环保贷”等政银合作融资支持范围和对象，引导县域金融机构将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鼓励把大型农业设施、农机具等纳入抵押范围，因地制宜开展优势特色农业保险业务。依托江苏股权交易中心探索建设“乡村振兴板”，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上市、挂牌、发行债券等方式进行融资。加大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网点建设，构建涵盖金融、电商等多功能的新型服务点。

（五）密切村企利益联结

以建立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构建联农带农长效机制，做好“分钱”大文章。鼓励村集体以房、库代资，以料、技融资，村企合作组建经营实体，并加强风险管理，在共同追求超额利润中共享收益。推动企业优化供应链，推动企业组织小农户按标准经营、培育新型主体开展规模经营，在此基础上组织供应链管理实体，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鼓励企业吸纳村集体、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或与合作社联营兴办企业，在明确权属权责基础上，在保证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不减的前提下，构筑权益共享机制。探索村集体土地资源资产化资本化路径，让土地溢价、上市红利覆盖每一个乡村利益相关方，为农民增收提供更多权益机会。

（六）强化社会责任引领

加强民营企业理想信念教育，引导民营企业提高政治站位，深化对共同富裕的思想认识。着力引导新生代企业家走进乡村，了解乡情，回报家乡。以乡村振兴为重点开展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专题调研，通过撰写报告、汇编案例、组织培训、媒体宣传，全面反映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回报家乡的成果，带动更多的民营企业投身乡村振兴。完善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编制社会责任领先企业榜单，推动民营企业回馈乡梓、回报家乡。弘扬光彩精神，组织“光彩行”活动，引导民营企业把振兴乡村的热情和行动聚焦到党委政府关切的产业中来，聚焦到扶危济困、助学修路等慈善事业中来，不断激发民营企业投身乡村振兴的内动力。

责任编辑：蒋建忠

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机制与效果研究

马 骏 杨 辉

摘要:在民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规范和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在现实中,民营经济党建工作的进展和成效如何?现有研究结论相对零散且缺乏统合性的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从权力形态演化的视角出发,提出党组织权力形态将经历“强制、功利、规范”三个阶段的假说。利用2000年至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进行探索,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扩散和治理成效确实遵循了上述权力形态演化三阶段。本文整合并扩展了民营经济党建工作的分析框架,同时也为如何更好地开展民营企业党的建设提供经验启示。

关键词:民营企业;执政党;党建工作;基层党组织;权力形态演化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事实上,在民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主要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通过党组织的嵌入实现对其的监督、引导和统合;二是帮助民营企业克服经济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产权保护不足、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增强经营信心,提升生产效率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因此,从执政党角度来说,党建工作是将民营企业统合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强党对民营企业主群体进行全面领导并巩固自身权力基础的重要途径。

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都明确要求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必须

建立党组织,但这些法律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尽如人意,即使建立了党组织,更多的也只是形式上的嵌入,并未起到实质性作用。因此,民营企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接受党组织的嵌入?如果接受了,到底是一种“形似”还是“实是”,背后的动机及其行为表现是否也会随着党组织嵌入的时间推移而改变?对此,本文重点关注两个问题:第一,民营企业党建工作背后的动力机制和逻辑是什么;第二,基层党组织嵌入后,民营企业的具体行为和效率是否会有所改变。

对于第一个问题,已有研究表明,组织内部的控制逻辑与外部的合法性逻辑是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关键动力机制。对于第二个问题,已有研究发现,在主观态度上,民营企业主对执政党相

收稿日期:2023-08-11

作者简介:马骏,江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家族企业公司治理、非公经济党建工作;杨辉,江阴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关政策有较高认可度，进而表示欢迎或主动寻求在企业内部建立党组织。但也有学者发现，部分民营企业主认为没有必要建立党组织，甚至采取被动应付和消极抵抗的策略进行抵制。在战略和绩效层面上，学者们从治理效率和效果、投资行为、社会责任履行、推动社会治理、绩效水平等视角，分析了党组织的治理价值。以上研究为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发现，但主要遵循功能学派的研究范式，更多地是以相对静态的视角来解析，只能解释某一区域或某一特定时段党建工作的动机、过程和效果，获得的结论可能存在偏颇，对于动态演进特征难有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也为本文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契机。

基于此，本文在新制度主义的合法性逻辑以及 Etzioni 的权力分类基础上构建分析框架，对本文关注的两个核心问题进行研究。

从合法性逻辑来说，一方面，党组织的嵌入是执政党通过建构行动、强制、权威化、扩散等形成“自上而下”的过程，同时也是民营企业对基层党组织嵌入的诠释、妥协、逃避、顺从、认同等“自下而上”的过程。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逻辑是重要的动力机制。从权力形态演化视角来说，党组织作为权力施者而存在，遵循外部控制逻辑。而民营企业则是权力的受者，受到权力施者的影响和控制，遵循外部控制逻辑和合法性逻辑。结合以上两个理论视角，提出本文的核心推论——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是执政党的权力形态在企业内部演化的动态过程：随着时间推移，党组织希望权力关系能够从强制向规范进行转化，其间表现出“以力制人、以利诱人、以义服人”的演化趋势；民营企业则相应地表现出“面服心不服、计算利害、心悦诚服”的演化趋势，进而在具体经营和管理中体现出相应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党组织的嵌入动机包括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对应于权力形态演化的强制、功利和规范特征，党组织嵌入对民营

企业的影响效应在权力形态的三个阶段也将有所差异。

本文的研究可能带来三方面的贡献。

第一，整合并扩展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研究的分析框架。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的合法性逻辑以及 Etzioni 的权力分类为基础，发现随着时间推移，民营企业内部党建的动力机制以及实际效果呈现出动态演化特征。由此，本文将过去相对零散的研究统合到分析框架中，进而为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第二，本文丰富了新制度主义的合法性逻辑文献。过去关于组织实践中的合法性逻辑，主要讨论三类制度要素作用的发挥以及边界条件，但对于其存在的动态演化过程有所忽略。本文的结论表明，在组织实践中，三类制度要素的作用会随着时间改变呈现出增强或减弱的趋势，往往会形成特定的组合发挥作用，三类制度要素组合作用的发挥也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变化。

第三，丰富了组织权力理论的研究视角。组织权力理论主要围绕组织权力的主客体、来源、分布、表现形式、作用过程等，讨论组织内部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所讨论的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问题，突破了传统组织权力理论边界，实则为不同层级组织之间的跨层次权力形态及其演变问题。在这里，权力主体是基层党组织，客体是民营企业，尽管形式上仍然是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实则是执政党通过党组织这一桥梁将民营企业纳入“政党-社会关系”网络中，从而实现跨层控制和管理。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1. 组织实践的三类制度合法性来源压力

新制度主义学派提出了三大制度要素：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认知性要素。其中，规制性要素以法律规则为合法性基础，扩散机制表现为强制性手段；规范性要素以道德支配为合法性基础，强调社会责任，扩散机制表现为规范性手

段；认知性要素以可理解和被认可文化为合法性基础，扩散机制表现为模仿性手段。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将这三类制度要素纳入组织制度分析中，组织同时面临技术和制度两种环境，前者是一种竞争性的效率逻辑，而后者则遵循制度化的合法性逻辑，由于组织面临着相似的制度环境，其结构与行为会越来越相似。这一过程涉及三种影响机制：强制性趋同、规范性趋同和模仿性趋同。

强制性趋同源于组织所依赖的其他组织向其施加的正式或非正式压力；规范性趋同源于专业化进程，专业人士和专业网络是其中的重要推动者；模仿性趋同主要是对不确定的一种回应。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扩散机制同时包含了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这三类合法性逻辑，但这三类逻辑并非无序出现，而是会呈现出一定的演化顺序。三类逻辑具体的演化顺序，本文将结合 Etzioni 的权力理论作进一步阐述。

2. Etzioni 的权力理论

学者们普遍认为，权力是个人或组织影响其他行动者或组织的能力，从这一观点出发，权力并不是一种单向的约束与控制，而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包含了权力的施者与受者，权力则表现在两者的互动关系中。

本文的分析建立在 Etzioni 提出的权力形态分类基础上。权力形态有三种表现形式，即强制的、功利的和规范的。这三种形式对应组织制度分析中的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逻辑。其中，强制的权力表现出强制性特征，是以力制人；功利的权力表现出功利性特征，以利益诱人；规范的权力表现出规范性特征，以义服人。作为接受约束和控制的权力客体，在其服从程度上有着较大差别：对强制性权力的反应是面服心不服，对功利性权力的反应是权衡利弊，对规范性权力的反应则是心悦诚服。进一步，权力形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产生一种内在的制度化和合法化过程。这表现为，作为权力的实施者，权力形态将经历“以

力制人、以利诱人、以义服人”的演化趋势，作为权力的受者，则相应地表现出“面服心不服、计算利害、心悦诚服”的过程，此则为合意的权力双方互动匹配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有着逐渐合法化的趋势：强制的与功利的权力有向规范的权力转变趋势，进而使得组织结构更为稳定。

（二）权力形态演化视角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动态分析

本文认为，基层党组织的嵌入实际上是执政党权力基础趋向合法化和稳定化的过程。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面对一个与自身目标和属性迥异的组织，民营企业可能会天然地具有排斥心理，此时，就需要以国家为背书，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如立法、政府号召等）推进；随着时间的推移，民营企业与党组织的关系将呈现更多地互动和资源交换，党组织的组织资源优势以及效率功能将会逐渐显现，进而表现出功利性特征，未设立党组织的企业也会模仿那些因设立党组织而取得高绩效的组织实践；当执政党通过各种渠道形塑民营企业主的认知框架，他们对于党建工作的认可度和积极性将显著提升，党建工作的社会功能价值将逐步体现，进而表现出稳定的规范性特征。接下来，本文将分三个阶段逐一讨论。

第一阶段，权力形态的强制性阶段。这一阶段对应于合法性逻辑中的强制机制，在这一阶段，党组织建设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压力，表现出以力制人的特征。一方面，《公司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活动提供必要条件。”这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法律强制性依据。另一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强调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性，由此各地区也因领导人的要求而推广党建工作。在法律和领导人意志的强制性压力下，很多民营企业将不得不在形式上建立党支部和党委。很多民营企业（尤其是家族控制型企业）对

于党组织嵌入企业表现出犹豫甚至抵制的态度，即使有党组织，更多的也只是形式上的嵌入，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其缘由主要是担心控制权的稀释和旁落，继而影响他们的经营信心和精力分配。此时，很多民营企业主会表现出“面服心不服”的特征。例如，部分民营企业主认为没有必要在企业内组建党组织，甚至采取被动应付和消极抵抗的策略来抵制基层党组织的组建，部分企业也因为家族的涉入弱化了党组织的积极作用。由此，从战略响应的视角出发，在面对强制性权力形态时，民营企业主更可能采取抵抗、回避或者形式上的妥协。因此，在党建工作早期阶段，权力形态主要表现为强制性特征，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并不稳固，也没有形成场域内的模仿性压力和规范性压力，“面服心不服”的境况将使得民营企业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在治理上，民营企业的关键决策和日常管理主要仍然由企业主个人做出，党组织更可能被排除在企业治理过程外，企业非正式治理特征明显。例如，Opper发现，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私人股东权力越大，公司中党委的影响力就越弱。有学者发现，高度的家族所有权涉入削弱了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意愿。朱斌等学者发现，企业主个人决策的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概率更低。在行为上，民营企业主对待党组织抵抗或者回避的态度，使得其在行为上表现出更强的短期导向性，如较少的研发活动。在绩效上，由于民营企业主对待党组织态度的消极性，党组织的建立对于企业绩效可能存在负面影响，或者影响不显著。

第二阶段，权力形态的功利性阶段。这一阶段对应合法性逻辑中的模仿机制，在这一阶段，党组织建设作为一种功利性的制度压力，表现出以利诱人的特征。首先，党组织的建立能够与企业治理有效融合，提升治理效率。例如，党委委员和书记兼任行政职务并参与董事会议和企业治理，这一人事交叉制度有利于将党建合理嵌入到公司治理结构中。进一步，党组织的建立还能够

有效规范民营企业高管行为。其次，从合法性角度出发，党组织的设立实际上是民营企业合法性地位的一种信号，或者说是民营企业对自身合法性地位的一种追求，这使得它们更容易被市场接受，同时还能够弱化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成为被模仿的对象。最后，就企业效率和绩效来看，党组织的建立的确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率 and 绩效水平。由此，从战略响应的视角出发，在面对功利性权力形态时，民营企业主的直接反应是计算利害得失，更可能采取默许或者迎合的态度。综上，随着党建工作的深入，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将逐渐稳固，民营企业将表现出如下几个特征：在治理上，民营企业开始接受党组织参与企业的日常管理和决策，企业治理逐渐表现出专业化和正式化特征；在行为上，民营企业主对待党组织的态度逐渐从回避转变为接受，使得其在行为上表现出一定的长期导向性，进而研发活动逐渐增加；在绩效上，民营企业开始利用党组织的组织资源优势来获得更优质的信息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绩效。

第三阶段，权力形态的规范性阶段。这一阶段对应合法性逻辑中的规范机制，党组织建设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制度压力，表现出以义服人的特征，这类制度要素以道德支配为合法性基础，尤其强调社会责任。在这一阶段，以利制人和以利诱人将进一步发展为以义服人，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更加稳定。从战略响应的视角出发，在面对规范性权力形态时，民营企业主将怀有一种感激的情怀，衷心欢迎党组织的建立。尤其是，党组织的建设不仅为民营企业提供合法性和利益，同时还将向民营企业中嵌入公共治理价值，使其拥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由此，随着党建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民营企业对于权力规范形态的反应是心悦诚服的，并将表现出如下几个特征。在治理上，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与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等部门的互动沟通机制、党组织与董事会联席会议等制度，促使党组织的主张与企业的决策有效融合，进而提高企业的治理效率。在

行为上, 民营企业主在内心中逐渐对党组织表示认可和欢迎, 能够充分利用党组织提供的信息、人才资源等, 强化长期投资信心。此外, 企业开始超越纯利益计算, 更多地表现出社会责任意识, 开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绩效上, 党组织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也将得到充分体现。

基于以上分析, 从制度合法性逻辑和权力形态的演化视角出发, 党组织的权力在民营企业中的建立将经历“强制、功利、规范”的演化过程, 基层党组织和民营企业由特定的畏威与功利的形态转变为稳定的规范关系, 此亦如韦伯所谓的制度化过程表征。为了验证以上推论, 本文重点从民营企业党建工作背后的机制逻辑, 以及随之带来的治理、战略和绩效表现来反映党建工作的权力形态演化过程。

具体而言, 本文提出以下待检验假设。

假设 1: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党建工作的强制性制度压力的作用将逐渐减弱, 规范性和模仿性制度压力的作用将逐渐增强。

假设 2: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党组织的建立使得企业的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正式化特征。

假设 3: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党组织引导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积极作用将逐渐增强。

假设 4: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党组织引导企业进行社会责任的积极作用将逐渐增强。

假设 5: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党组织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将渐趋正向化。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第 4 次至第 12 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 (2000 年—2016 年) 对民营企业的党建工作进行分析。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本文剔除了不符合客观事实、缺失值过多和异常值样本, 最终获得共计 32797 个有效样本。

(二) 变量测量

1. 基层党组织

历次调查问卷均询问了企业“是否建立党组

织”, 这一变量定义为虚拟变量: 如果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 则赋值为 1, 未设立党组织的企业则赋值为 0。

2. 制度合法性压力

(1) 强制性趋同。本文主要采用两个指标来测量强制性压力。一是民营企业中的政府和国有企业控股比例。这一变量实际上代表着民营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来自国家力量的干预。这一比例越高, 国家的意志和干预程度可能就越高, 其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作用也越强。二是企业是否注册为公司制 (即是否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 注册为公司制的民营企业实际上有法律责任在其内部设立党组织。具体而言, 注册成为公司制的民营企业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2) 规范性趋同。本文采用两个指标来衡量规范性压力: 一是民营企业主是否为行业协会会员, 如果是则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二是民营企业主是否为工商联会员, 如果是则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3) 模仿性趋同。本文采用行业以及地区中民营企业党组织建立的均值 (除去目标企业本身) 来衡量模仿性压力。

3. 党组织的治理成效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党组织的权力形态将逐渐由强制性向功利性和规范性转变, 由此民营企业对权力形态转变的反应也将随着改变, 具体会表现在其治理、行为和绩效上。具体而言, 本文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正式治理。通过文献梳理, 现有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测量家族正式治理。第一, 正式制度的制定。例如, 家族企业内部制定的“家族股权继承政策”“家族股权转让政策”“家族成员聘用政策”等所有权和人事聘用制度, 这类正式的制度体现了家族企业在正规组织和家族网络关系之间建立家族治理的制度化隔离。第二, 正式的决策和管理程序。主要包括授权和决策的去中

心化。前者主要是指企业将一定的决策权和控制权授权给各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而后者则是决策和管理并非集中于企业主本人手中。第三，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引入。包括职业经理人的引入，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建立，两职分离，独立董事的引入等。综合现有文献，本文对于治理结构的衡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设立情况。这源于不少民营企业建立了党组织与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等部门的互动沟通机制、党组织与董事会联席会议等制度，促使党组织的主张与企业的决策有效融合。董事会和监事会都设置为0-1的虚拟变量。二是企业关键决策的主体。如果是股东会、董事会、经理会、高层管理会议，则赋值为1；若是企业主个人，则赋值为0。我们将上述三个变量相加，合成为一个“正式治理”变量。

(2) 企业绩效。本文使用企业净利润和销售

收入作为绩效的测量指标。

(3) 创新投入。本文使用研发投入和销售收入的比值作为测量指标。

(4) 社会责任。本文分别使用企业捐赠活动和环境保护活动来衡量。捐赠活动使用企业的捐赠额度与销售收入的比值测量，环境保护使用企业治理污染投入与销售收入的比值测量。

4. 控制变量

本文分别使用了企业家层面、企业层面和宏观环境变量。企业家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党员、政治身份、体制内经验。企业特征包括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公关招待支出、资产负债率、家族企业。宏观环境变量主要是地区市场化程度，这一变量来源于樊纲等编制的市场化指数^①。此外，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加入了调查年份、地区和行业虚拟变量。

对模型中各个变量的测量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测量和编码

变量名称	变量编码
党组织	企业内设立了党组织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
强制性趋同压力	①政府/国有(集体)控股比例：各级政府、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持有的股份比例。 ②公司制：是否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如果是则编码为1，否则为0。
规范性趋同压力	①行业协会会员：是则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 ②工商联会员：是则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
模仿性趋同压力	①党组织_地区均值：各地区所有民营企业党组织建立情况均值。 ②党组织_行业均值：各行业所有民营企业党组织建立情况均值。
正式治理	董事会、监事会、关键决策由集体而非个人作出，三个虚拟变量相加。
企业绩效	①净利润：加1取自然对数。 ②销售收入：加1取自然对数。
创新投入	企业创新投入与销售收入的比值。
社会责任	①企业捐赠：捐赠费用与销售收入的比值。 ②环境保护：治理污染费用与销售收入的比值。
企业家性别	男性编码为1，女性编码为0。

注①：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更新到2009年，故2000年—2010年的问卷数据中市场化指数使用他们的数据来源；而王小鲁等(2017年)的市场化指数更新到2014年，故2012年、2014年的问卷数据中市场化指数使用他们的数据来源，由于没有2016年的市场化指数，故以2014年的数据替代。所有市场化指数均滞后一期。

变量名称	变量编码
企业家年龄	以问卷调查时间为基准，减去企业家出生年份。
教育程度	分别将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大学、研究生赋值为 1、2、3、4、5、6。
党员	具有党员身份编码为 1，否则编码为 0。
政治身份	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编码为 1，否则编码为 0。
体制内经验	企业家在开办企业前有过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单位的经历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企业年龄	以问卷调查时间为基准，减去企业登记注册为私营企业的年份。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公关招待支出	公关、招待费用，加 1 取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原始值。
家族企业	家族持股比例大于或等于 50% 的企业作为家族企业样本，编码为 1，否则编码为 0。
市场化水平	各地区滞后一年的市场化总指数，数据来源于樊纲等（2011）和王小鲁等（2017）。
年度虚拟变量	样本属于当年编码为 1，否则编码为 0。
地区虚拟变量	根据企业所在地区，重新编码为 30 个虚拟变量。
行业虚拟变量	根据企业主要从事的行业进行虚拟变量转换，包括农林牧渔、采矿、制造、电力煤气水、建筑、交通运输、信息服务、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租赁、科研技术、公共设施、居民服务、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公共管理 19 个行业，重新编码为 18 个虚拟变量。

四、数据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 T 检验

表 2 报告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以及这些变量的 T 检验值（有无党组织）。从 T 检验的结果来看，在不同分组中（有党组织或无党组织），本文关注的所有变量的均值均存在显著性差

异。首先，相比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在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中，三类制度压力都更强。其次，相比没有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建立了党组织的企业绩效（净利润、销售收入）更好，同时正式治理水平更高，创新投入、捐赠和污染治理支出更多。下文将进一步使用回归模型来探索本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无党组织样本 (N=23336)				有党组织样本 (N=9461)				T 检验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T 值	Sig.(双侧)
政府 / 国有控股	23336	0.5834	5.8932	政府 / 国有控股	9461	1.5156	9.1397	-10.9473	***
公司制	23336	0.4593	0.4593	公司制	9461	0.8474	0.3596	-28.4010	***
行业协会会员	20455	0.4426	0.4967	行业协会会员	8139	0.6831	0.4653	-37.6070	***
工商联会员	23336	0.5458	0.4979	工商联会员	9461	0.8363	0.3700	-51.2975	***
党组织_地区均值	23336	0.2719	0.0963	党组织_地区均值	9461	0.3203	0.0963	-41.2527	***
党组织_行业均值	23336	0.2707	0.1022	党组织_行业均值	9461	0.3244	0.0997	-43.3830	***
正式治理	23336	1.0624	1.0069	正式治理	9461	1.8723	1.0570	-65.0497	***
净利润	21616	3.0660	2.0922	净利润	8792	4.3607	2.4650	-46.3877	***

无党组织样本 (N=23336)				有党组织样本 (N=9461)				T 检验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T 值	Sig.(双侧)
销售收入	23336	5.5831	2.6493	销售收入	9461	7.3288	2.7528	-53.4538	***
创新投入	15684	0.0456	0.3334	创新投入	7162	0.0625	0.4738	-3.0788	***
捐赠	21385	0.1205	4.4531	捐赠	8958	0.2785	11.1441	-1.7647	**
污染治理	15381	0.0377	1.1756	污染治理	7100	0.0850	2.0153	-2.2092	**
性别	23336	0.8355	0.3707	性别	9461	0.8897	0.3133	-12.5041	***
教育程度	23336	3.7106	1.1358	教育程度	9461	4.0487	1.1568	-24.2919	***
企业家年龄	23336	44.4782	8.6316	企业家年龄	9461	46.9669	8.5576	-23.7147	***
党员	23336	0.2606	0.4390	党员	9461	0.4817	0.4997	-39.6642	***
人大或政协	23336	0.3374	0.4728	人大或政协	9461	0.5400	0.4984	-34.6109	***
体制内经验	23336	0.4849	0.5111	体制内经验	9461	0.6182	0.5150	-21.3583	***
企业年龄	23336	7.9737	5.2899	企业年龄	9461	10.2746	5.7364	-34.8150	***
企业规模	23336	2.1782	2.4670	企业规模	9461	2.8347	2.9587	-20.2189	**
公关招待	23336	1.2522	1.4071	公关招待	9461	1.8194	1.6837	-31.1891	***
资产负债率	23336	13.0884	269.4503	资产负债率	9461	59.2210	3154.9010	-2.2140	**
家族企业	23336	0.7497	0.4332	家族企业	9461	0.6598	0.4738	16.5717	***
市场化水平	23336	6.8141	1.9553	市场化水平	9461	7.0323	2.0101	-9.0833	***

注: N=32797; *p<0.1, **p<0.05, ***p<0.01。

文想要研究的问题。

(二)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 Stata12.0 进行数据处理以检验主要假设。本文的党组织变量是 0-1 虚拟变量, 故采用 Logistic 回归。本文中企业绩效 (净利润和销售收入)、正式治理、创新投入、社会责任 (捐赠、污染治理) 均为连续变量, 故主要采用最小二乘法 (OLS) 进行假设检验。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 我们对连续变量在 1% 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同时, 所有回归方程均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 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另外, 在动态趋势变化的回归分析中, 我们以 2000 年为基年, 将解释变量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放入模型进行检验, 以考察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时间变化趋势。

1. 民营企业党组织覆盖率的趋势分析

图 1 报告了 2000 年至 2016 年历次调查中, 民营企业内部党组织覆盖率的变化趋势。总体而

言, 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成效明显, 党组织的平均覆盖率为 28.26%, 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从 2000 年的 17.17% 增长至 2014 年的 35.88%, 增长了 108.97%。但在 2016 年, 民营企业内部党组织覆盖率有所减弱 (25.15%), 但也比 2000 年增加了 46.48%, 这主要是与调查样本有关, 2016 年中小企业样本过多, 多数中小企业并未建立党组织, 从而降低了整体比例。但总体而言, 从 2000 年至 2016 年, 国内民营企业中党组织的覆盖率呈现出递增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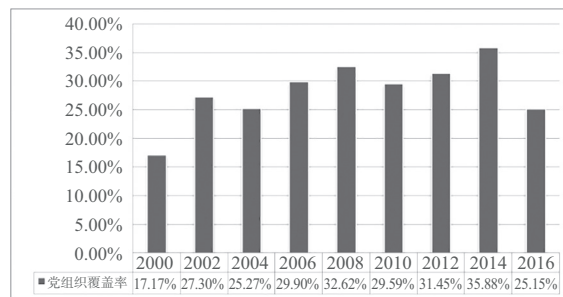


图 1 民营企业党组织覆盖率的历时趋势

2. 民营企业中党组织建立的制度压力趋势分析

表 3 报告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受到强制性、规范性和模仿性制度压力动态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 3 模型 1 和模型 2 检验了强制性制度压力的作用。模型 1 的结果显示, 虽然国有 / 集体控股以及其与各个年份的交互项没有表现出显著性, 但其分别与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的交互项系数均为负,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有 / 集体控股所形成的强制性制度压力的作用在逐渐减弱。模型 2 的结果显示, 公司制与党组织显著正相关 ($\beta=0.453$, $P<0.01$), 其与 2002 年、2004 年和 2006 年的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正。但其与 2008 年、2010 年和 2012 年的交互项不再显著, 并且其与 2014 年和 2016 年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模型 2 的结果表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公司制所形成的强制性制度压力的作用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

表 3 模型 3 和模型 4 检验了规范性制度压力的作用。模型 3 的结果显示, 行业协会会员的系数为负, 但不显著 ($\beta=-0.171$, $P>0.1$)。同样的, 其与 2002 年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而其

与 2004 年至 2016 年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由此表明, 从 2004 年开始, 行业协会会员身份所形成的规范性制度压力的作用日趋增强, 尽管增加的幅度有所减缓 (行业协会会员与 2014 年和 2016 年的交互项系数相对于其与其他年份交互项的系数较小)。模型 4 的结果显示, 工商联会员与 2002 年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beta=-0.609$, $P<0.05$), 而其与其他各年份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这同样表明, 从 2004 年开始, 工商联会员身份所形成的规范性制度压力的作用日趋增强, 尽管增加的幅度有所减缓。

表 3 模型 5 和模型 6 检验了模仿性制度压力的作用。模型 5 的结果显示, 党组织_地区均值的系数显著为正 ($\beta=6.319$, $P<0.01$), 其与 2002 年至 2008 年的交互项系数无显著性, 而与 2010 年、2014 年、2016 年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由此表明, 从 2010 年开始, 企业所在地区内其他企业建立党组织的多寡所形成的模仿性制度压力的作用日趋减弱。模型 6 的结果显示, 党组织_行业均值的系数显著为正 ($\beta=8.478$, $P<0.01$), 其与 2002 年至 2006 年的交互项系数无显著性, 而

表 3 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对制度压力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党组织	党组织	党组织	党组织	党组织	党组织
国有 / 集体控股	0.0144 (1.13)					
国有 / 集体控股 × 2002 年	0.0148 (0.96)					
国有 / 集体控股 × 2004 年	0.00645 (0.42)					
国有 / 集体控股 × 2006 年	0.0191 (1.23)					
国有 / 集体控股 × 2008 年	0.0101 (0.61)					
国有 / 集体控股 × 2010 年	-0.0181 (-1.29)					
国有 / 集体控股 × 2012 年	-0.0132 (-1.0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党组织	党组织	党组织	党组织	党组织	党组织
国有 / 集体控股 × 2014 年	-0.00630 (-0.42)					
国有 / 集体控股 × 2016 年	-0.00472 (-0.35)					
公司制		0.453*** (3.79)				
公司制 × 2002 年		0.553*** (3.10)				
公司制 × 2004 年		0.451*** (2.66)				
公司制 × 2006 年		0.483*** (2.89)				
公司制 × 2008 年		0.286 (1.64)				
公司制 × 2010 年		0.0395 (0.25)				
公司制 × 2012 年		-0.0375 (-0.24)				
公司制 × 2014 年		-0.103*** (-2.72)				
公司制 × 2016 年		-0.0139** (-2.09)				
行业协会会员			-0.171 (-0.87)			
行业协会会员 × 2002 年			0.265 (1.17)			
行业协会会员 × 2004 年			1.431*** (6.33)			
行业协会会员 × 2006 年			1.150*** (5.18)			
行业协会会员 × 2008 年			1.831*** (8.13)			
行业协会会员 × 2010 年			1.246*** (5.81)			
行业协会会员 × 2012 年			-- --			
行业协会会员 × 2014 年			0.473** (2.29)			
行业协会会员 × 2016 年			1.089*** (5.23)			
工商联会员				0.509** (2.49)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党组织	党组织	党组织	党组织	党组织	党组织
工商联会员 × 2002 年				-0.609** (-2.48)		
工商联会员 × 2004 年				0.961*** (4.09)		
工商联会员 × 2006 年				0.682*** (2.99)		
工商联会员 × 2008 年				1.529*** (6.36)		
工商联会员 × 2010 年				0.757*** (3.35)		
工商联会员 × 2012 年				0.779*** (3.52)		
工商联会员 × 2014 年				0.461** (2.13)		
工商联会员 × 2016 年				0.984*** (4.47)		
党组织_地区均值					6.319*** (8.49)	
党组织_地区均值 × 2002 年					-0.899 (-0.75)	
党组织_地区均值 × 2004 年					-1.001 (-0.98)	
党组织_地区均值 × 2006 年					-1.568 (-1.33)	
党组织_地区均值 × 2008 年					0.976 (0.78)	
党组织_地区均值 × 2010 年					-2.390*** (-2.81)	
党组织_地区均值 × 2012 年					-2.454*** (-2.98)	
党组织_地区均值 × 2014 年					-2.620*** (-3.22)	
党组织_地区均值 × 2016 年					-3.025*** (-3.58)	
党组织_行业均值						8.478*** (8.07)
党组织_行业均值 × 2002 年						-1.641 (-0.82)
党组织_行业均值 × 2004 年						-1.265 (-0.51)
党组织_行业均值 × 2006 年						-2.249 (-1.35)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党组织	党组织	党组织	党组织	党组织	党组织
党组织_行业均值 ×2008 年						-4.147** (-2.36)
党组织_行业均值 ×2010 年						-2.750** (-2.47)
党组织_行业均值 ×2012 年						-3.467*** (-3.20)
党组织_行业均值 ×2014 年						-3.871*** (-3.61)
党组织_行业均值 ×2016 年						-3.367*** (-3.14)
性别	0.154*** (3.66)	0.153*** (3.61)	0.0934** (2.06)	0.110** (2.54)	0.156*** (3.67)	0.152*** (3.58)
教育程度	0.151*** (11.13)	0.137*** (10.00)	0.132*** (8.99)	0.141*** (10.03)	0.139*** (10.16)	0.145*** (10.63)
企业家年龄	0.00673*** (3.72)	0.00665*** (3.64)	0.00657*** (3.33)	0.00617*** (3.28)	0.00663*** (3.62)	0.00651*** (3.56)
党员	0.694*** (23.95)	0.703*** (24.06)	0.610*** (19.18)	0.669*** (22.39)	0.697*** (23.79)	0.715*** (24.35)
政治身份	0.490*** (16.51)	0.494*** (16.53)	0.378*** (11.64)	0.317*** (10.24)	0.477*** (15.90)	0.518*** (17.27)
体制内经历	0.253*** (8.99)	0.227*** (8.01)	0.230*** (7.60)	0.213*** (7.40)	0.250*** (8.80)	0.254*** (8.92)
企业年龄	0.0447*** (16.63)	0.0454*** (16.73)	0.0379*** (13.03)	0.0327*** (11.50)	0.0434*** (15.95)	0.0428*** (15.65)
企业规模	0.100*** (14.39)	0.0969*** (13.95)	0.0921*** (12.65)	0.0937*** (13.19)	0.0954*** (13.65)	0.0978*** (13.90)
公关招待	0.127*** (13.23)	0.125*** (12.98)	0.115*** (11.04)	0.109*** (11.08)	0.124*** (12.70)	0.130*** (13.33)
资产负债率	0.00157** (2.55)	0.00141** (2.51)	0.00121** (2.12)	0.00124** (2.15)	0.00147** (2.46)	0.00131** (2.42)
家族企业	-0.402*** (-13.20)	-0.382*** (-12.60)	-0.422*** (-12.93)	-0.476*** (-15.28)	-0.434*** (-14.26)	-0.425*** (-13.94)
市场化水平	0.0360 (1.18)	0.0363 (1.17)	0.0105 (0.33)	0.0383 (1.23)	0.0133 (0.41)	0.0436 (1.42)
地区、行业、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108*** (-17.45)	-4.344*** (-16.96)	-3.621*** (-14.57)	-4.251*** (-13.91)	-5.169*** (-18.14)	-5.596*** (-18.01)
N	32797	32797	28594	32797	32797	32797
Wald chi2	4328.94***	4550.26***	3963.25***	5281.13***	4759.91***	4822.40***
Pseudo R2	0.1390	0.1475	0.1482	0.1799	0.1517	0.1513

注: *p<0.1, **p<0.05, ***p<0.01; 模型括号内为 Z 值; 另, 2012 年问卷中未询问企业主加入行业协会情况, 故这一年度的值缺失。

与 2008 年、2010 年、2014 年、2016 年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由此表明，从 2008 年开始，企业所在行业内其他企业建立党组织的多寡所形成的模仿性制度压力的作用日趋减弱。

以上结果意味着，基层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扩散主要受到强制性、规范性和模仿性的制度压力，但这三类压力不是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制性和模仿性制度压力的作用逐渐减弱，规范性制度压力的作用则逐渐增强。由此，本文假设 1 得到部分支持。

3. 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治理效果的时间趋势分析

表 4 分别报告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对治理、战略和绩效影响的变化趋势回归结果。

表 4 模型 1 检验了党组织对企业正式治理的作用。结果显示，党组织与 2002 年、2004 年、2006 年、2008 年和 2010 年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但其与 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的交互项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组织的设立使得民营企业内部的治理正式化和专业化程度逐步提升，但 2012 年以后这种提升作用相对有限。由此，假设 2 基本得

到支持。

表 4 模型 2 检验了党组织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结果显示，党组织与 2002 年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beta=-0.0316, P<0.05$)，与 2004 年、2006 年和 2008 年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而与 2010 年、2012 年和 2014 年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组织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逐渐从负面转向正面。由此，假设 3 得到支持。

表 4 模型 3 和模型 4 检验了党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模型 3 的结果显示，党组织仅与 2016 年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beta=0.272, P<0.05$)，但与其他年份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除 2010 年)。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组织对于慈善捐赠的正面引导作用并没有显著加强。模型 4 的结果显示，党组织与 2008 年的交互项系数无显著性，与 2010 年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beta=-0.0993, P<0.05$)，而与 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组织对于企业污染治理的影响逐渐从消极转变为积极，这也是党组织逐渐将自身公共价值理念嵌入民营企业中的表征。由此，

表 4 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治理效果的变化趋势回归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正式治理	创新投入	捐赠	污染治理	净利润	销售收入
党组织	0.505*** (8.98)	0.0250*** (3.42)	0.114** (2.35)	--	0.179** (2.28)	0.381*** (4.21)
党组织 × 2002 年	0.262*** (3.33)	-0.0316** (-2.27)	0.00517 (0.06)	--	0.0379 (0.32)	-0.308** (-2.07)
党组织 × 2004 年	0.227*** (3.24)	0.0748 (1.31)	0.647 (1.38)	--	0.00167 (0.02)	-0.345*** (-3.11)
党组织 × 2006 年	0.218*** (3.13)	0.00870 (0.79)	0.791 (0.59)	0.472** (2.40)	-0.212** (-2.04)	-0.462*** (-3.51)
党组织 × 2008 年	0.222*** (3.16)	0.0111 (1.43)	0.0496 (0.70)	0.00775 (1.25)	-0.236** (-2.14)	-0.415*** (-3.37)
党组织 × 2010 年	0.242*** (3.62)	0.0531*** (2.97)	-0.0323 (-0.19)	-0.0993** (-2.01)	0.726*** (6.63)	0.723*** (6.05)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正式治理	创新投入	捐赠	污染治理	净利润	销售收入
党组织 × 2012 年	0.0359	0.0155*	0.146	0.0460**	0.609***	0.545***
	(0.55)	(1.83)	(1.64)	(2.40)	(5.87)	(4.64)
党组织 × 2014 年	0.0495	0.0232**	0.0871	0.0172**	0.563***	0.678***
	(0.79)	(2.48)	(1.17)	(2.46)	(5.58)	(5.92)
党组织 × 2016 年	0.0884	--	0.272**	0.161**	0.459***	0.747***
	(1.38)	--	(2.57)	(2.34)	(4.27)	(6.43)
性别	0.0526***	-0.0184*	-0.378	-0.0384	0.165***	0.264***
	(3.40)	(-1.89)	(-1.53)	(-0.92)	(5.56)	(7.55)
教育程度	0.0828***	0.00191	-0.0921**	0.00503	0.169***	0.226***
	(15.15)	(0.72)	(-2.09)	(0.51)	(15.63)	(17.87)
企业家年龄	0.00237***	0.0000160	-0.00708**	0.00142	-0.000820	0.0105***
	(3.32)	(0.05)	(-1.97)	(1.00)	(-0.60)	(6.53)
党员	0.00746	-0.000114	-0.0929	-0.0146	0.0697***	0.166***
	(0.58)	(-0.02)	(-1.53)	(-0.67)	(2.83)	(5.84)
政治身份	0.0342***	0.00154	-0.0869*	-0.0181	0.470***	0.664***
	(2.69)	(0.28)	(-1.81)	(-1.11)	(19.21)	(23.73)
体制内经历	0.131***	0.00255	0.0274	-0.0268	-0.0853***	0.0381
	(11.26)	(0.49)	(0.27)	(-1.19)	(-3.83)	(1.48)
企业年龄	0.000402	-0.000593	-0.0150**	-0.00406**	0.0358***	0.0519***
	(0.35)	(-1.09)	(-1.98)	(-2.38)	(15.48)	(19.12)
企业规模	0.0420***	0.00166	0.00528	-0.00700	0.202***	0.248***
	(14.88)	(0.98)	(0.55)	(-1.64)	(30.94)	(35.58)
公关招待	0.0373***	-0.00161	-0.0454***	-0.0131***	0.473***	0.470***
	(9.01)	(-0.95)	(-2.75)	(-2.98)	(51.43)	(48.18)
资产负债率	-0.000002**	-0.0000003***	0.000002	0.0000005	0.000002*	0.000009***
	(-2.36)	(-3.04)	(0.54)	(0.53)	(1.74)	(5.79)
家族企业	-0.350***	-0.00611	-0.0993	-0.00312	-0.0296	-0.0645**
	(-27.87)	(-0.97)	(-0.90)	(-0.14)	(-1.17)	(-2.20)
市场化水平	-0.0253**	0.00253	0.0427	-0.00555	0.0163	-0.0223
	(-2.13)	(0.39)	(1.08)	(-0.23)	(0.78)	(-0.91)
地区、行业、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858***	0.0794*	1.893	0.218	-0.0406	1.397***
	(9.30)	(1.65)	(1.48)	(0.61)	(-0.24)	(7.19)
N	32797	22846	30343	22481	30408	32797
F	110.90***	5.71***	2.36***	3.11***	248.09***	341.95***
R2	0.1906	0.0256	0.0048	0.0072	0.3816	0.4032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 T 值; 2016 年问卷中未询问企业的研发投入, 故模型 2 中这一年度的值缺失; 2002 年和 2004 年问卷中未询问企业的污染治理情况, 故模型 4 中这两年的值缺失。

假设 4 得到部分支持。

表 4 模型 5 和模型 6 检验了党组织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模型 5 的结果显示, 党组织与 2002 年、2004 年的交互项系数无显著性, 与 2006 年和 2008 年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与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党组织对于企业绩效的作用逐渐由无影响转变为负面影响, 最终又转变为正面的积极影响。模型 6 的结果显示, 党组织与 2002 年、2004 年、2006 年和 2008 年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 与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且逐渐变大。这一结果与模型 5 中的回归结果相似。以上结果也从侧面反映出民营企业对待党组织的态度从最初的规避、对抗转变为默许、迎合和欢迎。由此, 假设 5 得到支持。

五、结论与讨论

在组织实践中, 在“组织中建立组织”并不鲜见, 如工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等在企业中的扩散和运行。但这些组织更多的是一种劳工自发形成的、不具有官方性质的组织形式, 而基层党组织作为一种组织化、制度化、常态化的机构, 在民营企业中的扩散、影响机制和成效也可能与上述机构有所差异, 同时还涉及权力形态的演化问题。事实上, 在民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 这可能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独特现象, 其中包含着促进经济发展、减小政治风险、倡导社会公益价值等多种目标。然而, 现有研究主要遵循的是功能学派的研究范式, 更多地是以相对静态的视角来解析上述问题, 对于动态演进特征难有令人满意的解释。由此, 本文试图从权力演化的视角进行解析, 具有以下研究发现。

第一, 从总体趋势来看, 中国民营企业的党组织覆盖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从 2000 年到 2016 年, 增长了 46.48%, 表明我国非公经济党建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在这一过程中, 基层党组织能够在民营企业中不断建立, 主要有三个机

制在起作用: 强制性趋同压力、规范性趋同压力以及模仿性趋同压力。进一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强制性和模仿性制度压力将逐渐减弱, 而规范性制度压力则逐渐增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形态逐渐从强制性的以力服人转变为功利性的以利诱人和规范性的以义服人。

第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民营企业对待党组织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斥、规避逐渐向默许、认可和欢迎转变, 即“面服心不服、计算利害、心悦诚服”的演化过程。这可以从党组织对民营企业的治理、战略和绩效影响的变化趋势得到验证。从治理的角度出发,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党组织的嵌入使得民营企业的治理具有更显著的正式化和专业化特征。这也意味着, 民营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分享企业内部的决策和经营权, 将党的政策、主张和党组织形成的意见及时贯彻到企业的决策中去。从战略的角度出发, 随着民营企业对党组织的逐渐认可和接纳, 党组织能够将长期导向思维、公共价值理念融入企业治理、经营和战略决策中, 进而引导民营企业进行更多创新和社会责任投入。从绩效角度出发, 随着党组织嵌入程度的加深, 民营企业主在与其接触中慢慢了解其嵌入的目的和运行机制, 从最初的怀疑慢慢变为认可, 进而能够充分利用党组织的资源、信息和人力资本优势来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

本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基于本文的数据, 我们无法准确识别出党组织嵌入过程中权力“施者-受者”互动关系的三个阶段(强制性、功利性、规范性)以及边界条件。例如, 哪些具体的治理、行为和绩效综合特征能够作为判断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权力形态的某一阶段。其次, 党组织权力形态的演化并不一定严格遵循“以力制人、以利诱人、以义服人”三个阶段, 有些企业可能只经历“以利诱人、以义服人”的阶段, 有些则始终处于“以力制人”阶段, 未来的研究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境进行解析。

责任编辑: 蒋建忠

结构功能主义辩证分析框架的重新审视： 回到马克思的视角

王里 李扬

摘要:当代政治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呈现出结构功能辩证分析的趋势,但这一结构功能的辩证关系因缺乏哲学上论证、缺乏与实践中人的真实生活相一致的具体人性假设建构,以及由于哲学论证与人性假设上不足,造成政治社会学结构功能辩证分析在理论建构与实际应用上都出现短板,以致这种分析的一般理论仍付阙如。本文尝试回到马克思,从马克思的相关观点来重建政治社会学结构功能辩证分析的框架。

关键词:政治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重建;回到马克思

一、引言

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特征。社会学从其诞生起对结构功能主义就有持续的关注与系统研究,在这种研究历史中,有强调结构第一,也有主张能动优先。在当代则出现了结构功能辩证分析的趋势^[1]。当代写作描述的社会结构功能现象,总体上已从早期结构功能主义对原始社会的考察转向现实政治社会的探究,因此,其中大量涉及社会政治现象的研究都是从政治社会学即“把社会和政治的解释变量综合起来”^[2]的角度展开的。事实上,在当代有许多著名学者同时身跨社会学与政治学两个学科,并在两个学科中都获得了双重认可^[3]。但国外学术界对政治社会学这种结构功能辩证分析的趋势很少在文献

上进行系统的梳理。作为近年多次重印与再版的经典教材,《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学科知识发展的基本总结中,虽然不顾有些学者的反对,坚持把“结构与能动”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两个基本主题之一^[4],但在梳理相关文献时只介绍了三种当代理论建构的努力,忽略了一些学者在具体社会政治行为研究领域上的进展,没有把一般的政治社会学结构功能理论建构研究与具体政治行为领域研究结合起来评价其现状,并找出当前学术发展要解决的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在国内,学术界通过对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亚历山大与卢曼等人的功能主义的介绍与评价,注意到了国外结构功能辩证分析的现状,也有少数学者如孙立平(2002)、徐湘林(2004)等基于当代中国社

收稿日期:2023-09-27

作者简介:王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李扬,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执行力提升研究”(23DJB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会转型现象理论解释的需要,力图建构相关分析模式,但迄今很少有人对政治社会学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为全面、准确地向国内学者反映当代政治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研究现状、进展与问题,本文拟系统梳理相关代表性文献,并尝试建构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来回应相关研究前沿在理论上的需要。

二、当代政治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述评

(一) 研究现状

当代政治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形成了结构功能辩证分析的趋势。一方面,这是学术界的共识。对于结构功能的关系,“实际上,除了少数几个不合作者,在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适当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不再是如何把一种东西化约为另一种东西,而是如何把它们关联起来,并使其相互作用……”^[5]。“类似地,政治科学家们也发现,他们越来越需要那些能把结构、过程和结果系统地综合在一起的复杂的研究设计。”^[6]另一方面,也是学术界学术建构的现实行动。贝尔特发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引人瞩目的新功能主义、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生成结构主义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都在追求消除结构功能的二元对立。具体到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大致有两种方向的建构。

一是对社会政治现象结构功能辩证关系一般理论模型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研究努力:其一是政治社会的辩证分析模型建构;其二是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框架建构。第一种类型的努力,包括结构化理论、策略-关系方法与形态发生学取向^[7]。这些都肯定了结构能动的相互作用,又试图发现结构能动互动的具体规则。结构化理论由吉登斯提出,基本观点是:结构和能动不是分离的实体,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结构只有通过能动才存在,但它又可以促进或限制能动行为;同时,行动也可以重建结构^[8]。哈依和杰索普提出的策略-

关系方法,则提出了一种具体的结构与能动如何作用的模型:一方面结构青睐某些策略甚于其他策略,另一方面行动者可以通过反思机制积极学习来形成改变结构环境的能力^[9]。由阿切尔提出的形态发生学取向,一方面强调结构能动通过时间关联的过程性,即结构功能的关联成为某种结构限定、社会互动到结构精制或再生产的循环;另一方面研究了社会生活中观念的作用^[10]。第二种类型的努力,是由伊斯顿率先建构的。这种分析框架的方法论来源是系统思想,即认为系统处于环境之中,并受到环境影响,必须做出适当反应以适应环境取得生存。应用到政治系统,就是面对社会环境的压力,包括要求与支持形成的输入,需要采取转换行动,以决策这种输出来回应^[11]。在这种系统分析中,当局或政治系统的行动即将社会输入转换为公共政策的过程是一种理论上的黑箱,因此,尽管它把政治系统看成是互动,却在总体上还是一种结构决定功能的结构主义。而且,这种结构主义更多地具有社会学早期功能主义色彩,即主张结构必然具有功能,但没有传统政治学那种探寻良好政治结构的精神。这正好体现了它产生时流行的学术思潮,即政治学行为主义那种科学追求与价值中立的旨趣。后来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向后行为主义过渡的时候,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学者将它改造成一种比较政治分析的框架^[12]。并与这种学术风潮的转变相应,使传统的政治系统分析具有了一定的结构功能辩证分析的特点。主要是往伊斯顿理论黑箱里照进了学术创新的光芒,提供了所谓的过程描述,即把伊斯顿的转换过程具体化为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与调整等阶段。这些政策过程的阶段与阿尔蒙德对政策功能的描述即所谓的提取资源、规制与分配等相结合,加上对系统的结构论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比较政治系统分析的结构、过程与功能相统一的体系^[13]。

二是对社会政治现象中具体政治行为的研

究^①。包括四种研究途径^②。其一是契约论的途径，如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后对原初状态的设定，使现代利益分化的政治公民重新回归不知有自我利益的未开化状态，从而形成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选择^[14]。其二是制度主义的途径，如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物治理之道中把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纳入立宪、集体选择与具体操作三个制度框架，以解释人们在公共事物治理上的成效^[15]。其三是公共选择的途径，如布坎南在《同意的计算》中强调立宪制度在政治市场下个人行动整合成集体决策中的重要性^[16]。其四是政策过程的途径，即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对主流解决问题理性政策过程模式的批判中，学者们纷纷跳出政策阶段单一的技术决定论，探索与建构政治权力、社会认识、政治组织等多因素参与的政策过程框架，如著名的多源流理论、倡导联盟与政策网络理论等^[17]。上述研究途径的共同点在于：一是研究公民的集体行动，如社会选择、公共事物治理、政治市场活动、政策活动等；二是追求政治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关联分析，如正义行为与社会结构之无知之幕后、公共事物治理行为与三种社会结构制度、政治市场行为与宪法规则、政策过程与社会多因素的结合讨论等。

（二）进展与问题

伴随着结构功能辩证分析趋势的出现，相关

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政治社会学结构功能辩证分析中涌现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理论，造就了一批有世界声誉的学者，甚至由此推动形成了一些分支学派或研究团体。其中最突出的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跳出社会科学上的结构能动二元分立现象，引发学术界大量跟进研究，成为引领当代学术风尚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再如，由伊斯顿开始发展的政治系统分析成为一种学派，在比较政治、公共政策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又如，罗尔斯的《正义论》推动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布坎南的政治市场分析促进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崛起；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治理之道带领了制度分析在政治学的流行；金顿为代表的多源流理论则表明政策科学开始走出传统理性解决问题政策过程模式的局限^③，展开范式革命之旅。二是由于这种理论研究的成果与学术风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关学术研究的科学化。结构功能辩证分析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社会生活中结构功能关系认识的深化，即突破了长久以来的结构功能二元论思想，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与把握社会生活中的宏观与微观、行为与结构、主体与客体、社会与个人等多种现象之间的真实互动关系。特别是从政治学的发展来说，现代以来其在行为主义旗帜下追求科学化，虽取得重大进展，却因行为主义事实与价

注①：国内孙立平与徐湘林的研究，从现有文献看都是一种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实践的理论分析，既具有西方研究的共性，即在实践解读中将社会结构与过程统一起来；又存在一般理论建构的不足，如孙立平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实践的逻辑，徐湘林的研究本身只是追求对具体的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过程分析。与上述两位学者不同，刘小年（2009）的研究，在其早期（2006）对农民工政策实践模式理解的基础上，力图从哲学角度，即系统论与矛盾论相结合的角度，论证结构功能的辩证关系，并尝试建构政治现象结构功能辩证分析的一般框架。但这种努力只是初步的或启发性的，如其中行为的概念还没有展开或没有揭示其环节与阶段。本文的研究则继承了这种一般性研究的方向，在文献梳理的前提下，以回到马克思为视角，有针对性地尝试从理论上，比较系统与严密地建构政治社会学结构功能辩证分析的框架。

注②：这些途径，都具有从社会结构，包括社会状态、制度、观念、组织或关系等，论述人们的政治行为或相关后果的思维路径，符合当代结构功能辩证分析将社会结构与行为相关联的基本特征；同时，又都是将政治行为放在社会下观察探究，具备政治与社会相结合研究的政治社会学特点。因此，本文将它们从各种学科中放到政治社会学之下、结构功能辩证分析的文献范畴里分析。

注③：注传统政策过程模式把政策过程视为解决问题的理性程序，金顿的研究则突破了这种技术路径，提出政治流为政策过程的基本事实，并以“政策之窗”来描述现实政治、问题与政策多方面互动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

值相分离的二元论最终功亏一篑，因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不得不转入后行为主义，主张“关联与行动”，出现了追求结构、过程与后果相统一的研究趋势。可见这种结构功能辩证分析趋势的形成，既是政治学科学化的要求，也是标志政治学科学化一个重要进展。三是有关理论与研究在政治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现实作用。例如，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基础上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就在英国工党与欧洲社会民主党政治实践中产生了重要影响^[18]；20 世纪 70 年代起席卷全球的治道变革与新公共管理运动，其市场化改革就与政治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当代发展中公共选择之政治市场分析直接相关^[19]；当前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也与政治哲学研究引发人们对公共行政价值的关切脱离不了关系^[20]；而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治理之道，更是在全球公共池塘资源管理上得到广泛应用；等等。

与上述进展相应，在研究中也存在如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对社会政治现象结构功能辩证关系的哲学论证。虽然在当代，“所有的人都关注于理解结构和能动如何彼此联结并相互作用”^[21]；但是由于结构功能之间的关系太过抽象与复杂，不仅支配并迷惑了哲学家达数世纪之久，在当代也没有人对此提出解决之道，许多人只是在日常经验上感到结构功能之间的辩证关系^[22]。如政治社会辩证分析模型建构的代表性学者吉登斯说，“关于实践概念和人类劳动的改革能力（这是我希望涉及的特殊的方面）”^[23]，即他以实践为其结构化理论建构的出发点，但并未进一步从哲学上追问，为何实践中人的社会生活要以这种结构功能关系呈现？与之相似，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框架，以系统论为理论前提，但系统理论不算一种哲学观在学术界尚有争议^[24]。因此，政治系统分析从系统论角度解释社会政治现象的结构功能特征，在哲学上也是先天不足。至于其他研究政治行为的学者，由于研究对象的专门性，多数基于后实证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在政治学中典

型地反映在后行为主义追求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上来写作）没有直接的动力来探讨哲学上的结构功能关系，也没能提供这样的关系说明。二是缺乏与实践中的真实生活相一致的具体人性假设建构。“显然，一切科学总是对人性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5]特别是对政治社会学来讲，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因此，离不开人性假设的支撑。但恰好在这点上，当代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存在严重局限，它主要是从引用现存人性假设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很少在人性假设上展开属于自己的探索。由于现存人性假设及学者们借用这种假设的方式造成了当代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大不足，即它的人性假设具有抽象性，不能科学描述人的真实生活世界。具体来看，最典型的是吉登斯，他的理论建构以实践为起点，但他并没有完整引用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性的一系列具体论断，如马克思关于人的实践生活的人体、需要、劳动等知识逻辑^[26]，因而对人的政治社会生活的理论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的人的生活，成了一种随意的概念创造游戏，由此提出的历史观也背离了唯物史观阐明的科学规律。另外，那些具体的政治行为理论的研究，主要借用了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因而在研究中不得不寻求一系列经济人假设之外的具体社会事实来补充自己建构的理论，例如，罗尔斯利用无知之幕后屏蔽经济人对自己利益的把握与追求以达成社会选择上的正义后果，布坎南的公共选择与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治理之道都不约而同借助社会制度来寻求集体行动上的效果，等等。三是由于上述哲学论证与人性假设上的不足，造成政治社会学结构功能辩证分析在理论建构与实际应用上都出现了短板。一方面，理论上结构功能辩证分析的模型并未形成，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作为最成熟的作品，因为缺乏结构功能辩证关系在哲学上的理论自觉，最终结构二重性的分析变成了单边

的行为分析^[27]；至于策略-关系方法本身还只是对策略现象的分析，达不到一般的可以普遍解释的理论高度；形态发生学取向则主要是指出了结构功能之间的时间循环现象及相关文化阐释，也没有形成普遍的理论解释能力。政治系统分析的模式，虽然是一种普遍性的理论框架，但受系统论限制并没有从政治主体的互动实践来解释政治，其描述的政治过程即政策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传统的线性的政策阶段论，与现实中因社会与政府互动呈现的政策过程连续与中断相统一的特征相背离。另一方面，那些具体领域的政治行为研究，因为研究对象限制都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有解释力，而且由于其人性假设上的抽象性，往往要依靠制度等社会结构因素来说明，对于现实实践中社会与个人多因素复杂互动的生动过程，只能形成一定程度的解释，也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应用。在这种具体政治行为研究中，政策过程研究虽然涌现了一大批新理论，但受旧的经济人假设束缚，并没有彻底打破传统的理性政策过程模式的那种阶段论特征，也没有取代传统模式的主流地位^[28]。考虑到一般的政治社会结构功能辩证分析模式在进行具体社会政治现象结构功能辩证分析上的指导价值，为了更自觉地开展具体社会政治现象的结构功能辩证分析，必须勇敢面对当代政治社会学结构功能辩证分析一般理论建构的欠缺，把这种一般性理论研究作为相关领域学术进步的一个基础性课题来对待。

三、从马克思的视角重建政治社会结构功能辩证分析框架

（一）理论重建的出发点：回到马克思

从马克思的相关观点来重建政治社会结构功能辩证分析的框架，主要有以下考虑。第一，从现有研究中关于一般性政治社会结构功能辩证分析模型的建构情况来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一个影响最大的研究成果，而这种研究成果建构的起点，正是利用了马克思的思想，是从马克思的实践出发的。因此，回到马克思，从马克思相

关观点出发，应该是借鉴现有研究的一种成功经验。第二，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性假设主要是经济人假设的抽象性，与现实实践中具体生动的人的生活不相符，由此在学术建构时发展出来的概念容易脱离实际，成为主观的随意创造，也在具体政治行为研究时对人们的视野产生限制，使建构的学术知识不能全面反映人的特定政治生活情形，以致为了与生活一致，不得不在基本人性假设之外，引入其他社会因素来补充，因而影响到建构知识的逻辑严密性。马克思对人的社会生活的认识，恰好是这种抽象人性论的反动，即不是从抽象的、任意的教条出发，而是立足在现实前提之上。“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29]可见，从马克思人性思想出发，可以克服现有研究人性假设的短处，从而展开政治社会结构功能辩证关系理论分析框架的新演绎。第三，当代政治社会学结构功能辩证研究虽已成流行趋势，但学术界对这种辩证关系的把握主要还是一种对生活的直觉，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哲学上的论证，由此也影响到相关学术建构的严谨性。要对结构功能辩证关系进行哲学论证，显然离不开唯物辩证法的应用。唯物辩证法，从学术史来讲，正是马克思的一大哲学发现。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同时又说，“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30]。因此，这也是回到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理由。

（二）马克思眼中的世界与人的生活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是按唯物辩证法的规律运行的。对此，恩格斯描述说：“当我们深思熟

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各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31]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两个总特征，即普遍联系的观点与运动变化或发展的观点。这两个特征，实质上指出了世界的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规律。由于世界是由相互联系的事物构成的，因此，具有结构性；同时，这种相互联系的事物又在运动变化，也就是说具有相应的功能。所以，世界本身是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至于普遍联系的世界为什么会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恩格斯阐述的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即矛盾规律或者说“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32]。也即事物以矛盾的方式相互作用，由此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变化。把这一条与上面讲的世界的结构功能相统一的关系放到一起，可知世界就是事物之间以矛盾方式相互作用而运动变化的统一体。也即世界具有结构（统一体）、行为（相互作用）与功能（运动变化）相统一的特点。

既然世界是结构、行为与功能相统一的，那么作为世界中的一种具体存在——人是怎样以结构、行为与功能相统一的方式生活的呢？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3]。由于人是有生命的个体，具有肉体组织，为了维持肉体生命，需要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必须面向自然开展生产劳动，也即马克思讲的人体、需要与劳动；但是，要开展生产，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因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34]。因此，“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

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35]。总而言之，人作为一种现实的生命存在，就是在一定社会关系或结构条件下，通过生产劳动或行为，而获得生存即生命的维持与发展的。人的现实生活，是一种具体的在实践活动即行为中实现的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体。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6]一方面，个人的现实生活即实践以社会为必要条件与场域；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社会又与个人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得以重建，同时，个人的生命也在这种实践中再生产。

（三）政治社会的结构、行为与功能

马克思说：“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37]政治是从个人的生活中产生的，因此，它也服从人的生活所具有的结构、行为与功能相统一的特征。

从马克思的思想来看，政治社会的结构与其他社会的结构一样，是个人为了生产与生活而与他人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因此，可以从个人实践需要的社会条件来分析，如此可以发现四个基本因素。一是社会利益。马克思说，“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38]。社会的生产与分配关系现实地构成了个人利益追求的必要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追求利益的结果。二是社会观念。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发现：人还具有‘意识’”^[39]。也就是说，人的实践是受其意识引导的。因此，也必然会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三是社会组织。由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0]。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得独立，因此，必然在实践中要与其他人建构各种需要的社会关系，形成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四是社会制度。由于个人生活的社会性，必须要有各种社会规则来指导有差异的个人开展社

会合作，以形成必要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社会经济生活之上，耸立有一定的法律制度与上层建筑^[41]。概括起来，在现实社会，个人满足自己需要的实践活动就是在社会利益的引导下，在社会观念的影响下，通过与其他人互动而建构或参与各种社会组织，并依据一定社会制度来行动而实现的。同时，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生命生存本性的观点，社会结构四大因素互动实际上形成了个人参与的两个社会实践场域：一是与个人生命的生产相关的社会生产领域，即马克思讲的，“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与“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42]；二是公共管理，即对由个体互动形成的社会生产活动进行管理与服务的社会上层建筑。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场域，在现实个人的生活实践中，又按照与个人需要满足相关问题处理的关系远近，区分为直接的个人实践场景及间接的背景两种存在。场景方面包括与个人要解决的问题直接相关的社会主体及相关的社会生产与公共管理活动、活动发生的社区；背景则是社会场域作为个人实践场景的外围事物，即以一般性条件或社会共同体方式存在的其他人与他们的社会生产与公共管理等活动及其场所和外部世界。

从历史来看，政治社会是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出了剩余产品，社会为争夺剩余产品分裂为不同的阶级，为了控制阶级矛盾产生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43]因此，政治社会与产生它之前的原始社会不同。一方面，它的社会生产领域形成了利益分化的阶级；另一方面，由于这种阶级分裂，社会公共管理领域的氏族变成了政治上层建筑即国家。对此，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特别是以分工决定的阶级为基础，国家才以一种虚幻的共同

体形式产生了。”^[44]

政治社会的行为，也服从人的行为的一般逻辑。根据马克思观点，人的行为具有人体、需要与劳动的逻辑结构。进一步展开，人的行为与人体相关必然具有一个主体作为动作的发出者与承受者；同时这种主体行为的动机是为了需要的满足，或者说因为存在需要与满足需要的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即问题；为了解决问题，主体在意识引导下开始面向自然进行生产活动即劳动，也即主体利用资源来解决问题；这种解决问题的过程并不是由主体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而是与他人互动，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实现的。把这些归纳起来：人的行为，就是主体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根据自己的认识、利用资源、解决问题的过程。引申出来即：政治社会的行为，就是政治社会主体在政治社会，依据自己的认识，利用政治社会的资源，解决相关问题的过程。按照上面阐述的政治社会产生的情形，所谓政治社会主体就是分属各种阶级阶层的社会公民；政治社会即指出现了阶级分野或利益分化以及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政治社会的资源，根据恩格斯的发现，国家主要是生成了一种强制性的社会权力^[45]；政治社会的问题，指政治社会主体的需要与其在政治社会拥有的利益的差距，如果这种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有政府公共权力的介入，则是具有政治性质的问题^[46]。同时，政治社会这种人的行为与所有社会形态人的行为一样，都是以与他人相互作用为条件而实现的。因此，政治社会的行为也必然是人与他人的互动，只是这种互动的资源、主体等都打上了政治社会的特征。所以，要说明政治社会的行为必须具体描述人与他人在政治社会互动的环节及由此产生的阶段。关于互动的环节，也可以由政治社会行为模式来说明，即政治社会行为的过程是由其相关因素决定的。由此可以发现，政治社会的行为是围绕政治社会主体面临的问题及为了解决这种问题而展开的。具体环节，一是认识，即对问题、环境及资源等的认知，由

此形成行动的策略与选择；二是表达，即以言论或行动的方式向问题相关的政治社会主体提出或展示自己对问题处理的要求或看法；三是回应，即相关政治社会主体收到相应表达后，通过自己的认识加工，对表达做出反应。在现实生活中，这三个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行为过程。在政治社会，需要政府介入的政治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的处理都是由这三个环节构成。一般在政治社会主体围绕特定问题首次互动生成的社会公共生活中，相关主体的互动基本上都是基于自己的选择，而且其行动的范围也一般限制于利益关系人即与问题直接相关方面。由此形成了一种最初的政治社会秩序。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政治社会行为的自发阶段。在这个阶段，利益相关方不管有没有就问题处理达成一致，都会形成一个结局。结局有可能是解决了问题，因而双方互动也就到此为止。结局也有可能是问题未解决，而提出问题的一方又无资源延续进一步的行动，因而问题会沉淀下来，相关行动也会暂时终止；如果问题未解决，而问题相关方还有进一步行动的资源，则有可能展开下一步的行动，这种行动可以是问题相关方的利益共谋，也可以是问题提出方的单边主义选择，还可以因社会环境中其他主体的主动介入而发动。当通过“认识、表达、回应”的环节形成一个完整的行为过程，接着又开始新的历程时，政治社会行为的发展就进入一种扩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其影响超出了利益相关方的范围，一般要么有上级管理机关的介入，要么有更广泛社会方面的动员与参与；其形式，可以是问题向上级上交，也可以是通过媒体等向环境扩散，或者是二者的结合；在这个阶段，问题在更广泛的范围或更高层次得到定义，有时会衍生新的问题，也更有可能要求问题相关的利益即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包括可能提出改革等主张；其结局，有可能解决或未解决问题，或在问题处理中因制度或组织矛盾也有可能调整社会制度或变革其组织，以及由此造成政治社会意识的变化。一般来说，

进入扩展阶段的问题不是牵涉的社会主体较多，就是与所参与的社会实践领域内的社会结构因素相关，因而难以一次性处理即简单地以自发过程来解决，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甚至一些复杂的问题都不能通过一次扩展行动而解决，会出现政治社会行为的再扩展，或者说行为环节的多次循环。可见，政治社会行为的过程，通常有一个自发的阶段，也会有条件地形成一个扩展的阶段。通过这些阶段，政治社会的实践表现为由开始到发展，甚至终结的形态变化。伴随这种形态变化，政治社会的实践也着手其场域的改造，即由一开始的单纯的场景变成一种背景与场景相混合的场域，然后这种混合的场域又作为新的场景起作用，并有新的背景来环绕它。

由于政治社会行为的展开与阶段的发展，也就产生一定的结果，即政治社会的功能。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47]可见，政治社会的功能可以从人的活动与环境两个方面的变化来分析。人的活动的变化，在此指问题的处理；以及由于问题的处理，政治社会主体的资源即权力、认识与需要的变化等。环境的改变，包括直接的场景与间接的背景的变化。直接的场景变化，主要是与问题直接相关政治社会主体互动所在社区的人与事的变化等。间接的背景变化，即围绕场景的政治社会的变化。两种环境的变化，在理论上都可能涉及社会组织、社会利益、社会观念与社会制度等方面；也会涉及两个社会场域的变化，即社会生产与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化。由于上层建筑即公共管理是为社会生产服务的，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两个场域的变化常常以互相作用的方式呈现：一方面，社会生产是基础；另一方面，如恩格斯指出的，“上层建筑可以对经济基础产生三种形式的反作用，即促进、维持与阻碍”。结合默顿描述的社会政策反功能原理^[48]，总体上政治社会功能呈双向演变：一方面，是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生产，维持社会上层建筑；另一

方面,是社会问题解决受阻,进而影响社会生产顺利进行,甚至发出社会上层建筑变革的呼声。对此,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9],具体则表现为社会生产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在笔者看来,社会发展中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在于人的本性是一种现实的生命存在,需要开展生产活动;也由于个人的弱小需要以社会合作方式进行,需要对这种社会合作进行公共管理。社会发展本身是以社会条件方式与个人努力相结合形成个人满足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源即利益并与个人需要相关联产生人的生活的具体问题,然后通过这种问题的解决而体现的。政治社会中人们的行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问题出发的,而这种利益矛盾的产生反映了社会结构的矛盾。因此,这种问题的解决即主体实践的展开与发展,必然要求社会结构的在场与变化。或者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种宏观理论在实践中是通过形成与解决政治社会主体面临的具体社会问题来完成的。由于主体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也就是其现实生活即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所以,“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50]。

四、结论

当代政治社会学出现了结构功能辩证分析的趋势,西方学术界关注到其中的结构功能辩证分析模式建构的方面,对于20世纪70年代后就具体政治行为研究方面的结构功能关联努力则未能予以梳理。事实上,当代政治社会学结构功能辩证分析正是在辩证模型的建构与具体政治行为的研究两个领域内大致平行展开的。系统梳理文献发现,相关研究虽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在整体上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对结构功能的辩证关系在哲学上缺乏论证、人性假设具有抽象性、在结果上理论模式建构未能完成及政治行为研究成果在应用上具有局限性。由此也突出了政治社会结构功能辩证分析模型的理论重建任务。

进行理论的重建,回到马克思是一个适当的

出发点,这样既可以借鉴吉登斯研究的经验,也可以克服现有研究在人性假设上的不足,特别是可以应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对结构功能辩证关系进行哲学论证,形成理论的自觉。

回到马克思,可以发现以唯物辩证法运行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以结构即事物之间的联系、功能即事物的发展、行为即矛盾的方式相互作用而存在的,或者说世界是在行为即矛盾中联系着的事物的变化发展,也即世界是在行为中以结构功能相统一的形式呈现的。

与之相应,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具体而现实的存在,正是在一定社会结构条件即社会利益、观念、组织与制度等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生产与公共管理场域——这种场域又按与人的生活问题处理的关系远近以人的活动的直接场景与间接背景的方式起作用——把自己的意识与资源相结合,与他人互动,以解决自己的需要与利益之间的矛盾即问题而维持自己的生命并获得发展的过程。而在个人的生产生活中发生的政治关系,本身也是政治社会主体,在一定政治社会结构即利益分化的阶级社会与政治上层建筑条件下,根据自己的认识,利用权力资源,与他人互动,解决面临的问题的。这种互动,在过程上表现为认识、表达与回应三个环节,区分为自发与扩展两个阶段。其功能,从正负角度来讲:一方面,是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生产,维持社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是社会问题解决受阻,进而影响社会生产顺利进行,甚至发出社会上层建筑变革的呼声。

以上建构,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基于实践的,将个人与社会关联起来,解释个人生活与社会变迁的新理论框架。这个框架之新,不仅在于它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坚实的哲学基础之上,是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的;而且在于它在理论与实践上有如下基本价值。第一,突破了作为社会学结构功能辩证分析主流理论之一的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在结构行为合二为一的过程中滑入单边行为分析的局限,形成了一个结构、行为与功能都与人的

生活现实相契合的一般性解释框架，这对结束二元论、推进结构功能辩证分析无疑具有基础性意义。第二，它回到马克思，又突破了教科书对马克思的理解，如对唯物辩证法的结构功能辩证阐释、对人的生命生存的解释等，从而把宏观的唯物史观与微观的解决个人现实问题的个人生活有机统一起来，并在这种个人问题处理的过程中，通过个人与社会领域四种因素、两种场域、两大环境的互动，抛开了长久以来徘徊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上单一经济决定论的阴云，由此不光在社会微观生活而且在宏观生活层面都形成了一定的解释能力。第三，在实践上，本文对政治社会结构、过程与功能的一般理论描述，有利于指导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主动促进社会发展；有利于政府根据社会问题的发展来引导社会进程，实现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协调，提升公共管理的水平；也有利于公民根据个人与社会互动的规则来形成行为规则、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以追求个人幸福与社会有序发展的统一。

参考文献：

- [1][5] 博曼. 社会科学的新哲学[M]. 李霞,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97-198、197-198.
- [2][3][6] 古丁, 克林格曼. 政治科学新手册[M]. 钟开斌,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165、165、25.
- [4][7][8][9][10][21][22] 马什, 斯托克. 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M]. 景跃进, 张小劲, 欧阳景根,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79-298、267、286-287、287-289、292-297、286、280-283.
- [11] 伊斯顿. 政治生活系统分析[M]. 王浦劬,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37.
- [12][13] Gabriel A, Almo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M]. New York: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2001: 37、43-50.
- [14] 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36.
- [15] 麦金尼斯. 多中心治道与发展[M]. 毛寿龙,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6-8.
- [16] 布坎南, 塔塔克. 同意的计算: 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M]. 陈光金,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6.
- [17] 豪利特, 拉米什. 公共政策研究: 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M]. 庞诗,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212-222.
- [18] 金小红. 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第三条道路”[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1): 36.
- [19] 彼得斯.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 吴爱明, 夏宏图,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25-55.
- [20] 登哈特. 新公共服务: 服务, 而不是掌舵[M]. 丁煌,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45.
- [23][27] 吉登斯.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的批判[M]. 田佑中, 刘江涛,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231、287.
- [24] 陆剑杰. 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新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102-103.
- [25] 休谟. 人性论[M]. 关文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6.
- [26][30][34][41][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9、111-112、2、32、32-33.
- [28] 刘小年. 政策科学: 范式革命、假设转换与关系框架[J]. 理论导刊, 2011(2): 58.
- [29][33][35][36][37][38][39][40][42][44][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66-67、67、344、56、7、82、81、56、80、84、171.
- [31][5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59、695.
- [32][43][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10、174、59.
- [46] 邓恩. 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 谢明, 杜子芳, 伏燕, 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156.
- [48] 默顿. 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M]. 林聚任,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297-303.

责任编辑: 尔东

大思政格局中的高校“三全育人” 评价体系研究

李媛媛

摘要：“三全育人”突破传统学校德育范围，强调从“全员”“全程”“全方位”三个方面构建一体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筑大思政立体结构，形成强大德育合力。然而，目前尚未形成可供推广的典型经验，还没有统一的评价体系。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事关育人发展方向及成效，是高校育人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的内在要求。“三全育人”评价是高校完善大思政格局的关键环节。构建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体系，要坚持“三个统一”：政治性和系统性的统一；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统一；知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高校“三全育人”评价包括主体、客体、标准、方法、参照系统等相互关联的基本要素。高校“三全育人”评价，是教育主管部门统筹管理、客观评价、指导帮带，提升高校育人成效的重要“指挥棒”，有助于高校健全“十大育人体系”为核心的制度机制。数字化赋能高校“三全育人”评价，有助于形成长效机制，实现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和诊断性评价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各高校大力推进“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致力构建大思政格局，打好人才培养“组合拳”，提升教育发展质量。但迄今，尚未形成大思政格局中的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体系，高校教育评价的“指挥棒”

作用有待充分发挥。因此，要建立健全“三全育人”评价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

一、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体系的建构原则

（一）政治性和系统性的统一

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体系具有政治性。“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2]“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重在一个“全”字，其核心思想在全面育人。“三

收稿日期：2023-08-28

作者简介：李媛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现实问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KDB029）暨北京市思政重点课题（BJSZ2020ZD08）“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体系研究”的研究成果。

全育人”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相适应的独特理念和实践模式。反映时代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三全育人”评价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高校管理理论为指导,具有政治性、指引性。

高校“三全育人”评价具有系统性。首先,从内部管理上,体现在评价高校“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1]的育人成效。“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强调育人的主体、时间和空间上的统一,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育人整体。一是全员育人上形成合力。前提是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坚持全员参与育人,关涉育人的合理方式与实践边界问题。二是全过程育人上的有效衔接。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与学生成长过程,关涉“规范性逻辑”和“知识性逻辑”的辩证关系。三是全方位育人上的有机联动。关涉线上线、课内课外及家庭、社会、学校多领域,多向互动的动态平衡良性循环的大育人格局。其次,从外部社会大环境上来看,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属于中观层级,需要所在的省(区、市)立足于自身战略定位,有效整合教育系统外的优质资源为系统化的高校育人资源网,提供育人的大环境。最后,高校的各个院(系)要充分挖掘各项工作蕴含的育人元素和育人逻辑,并作为职责要求和考核内容融入整体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环节,构建微观的一体化育人体系,不断完善高校“三全育人”微观成效。

(二) 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统一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是高校“三全育人”评价科学性的前提。一切从高校的实际出发,从高校的客观条件、文化因素、社会环境、学校管理、教育对象、队伍状况等,客观、真实、准确、公正地反映高校“三全育人”工作的质量与效果。同时,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和育人工作规律。高校“三全育人”工作各个岗位,都有其规范的工

作流程和严格的工作要求,具体体现在课程育人、组织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科研育人、资助育人、网络育人、实践育人等方面。

开展高校“三全育人”评价,要选取具有独立性、简明性的评价指标,更要选取有可比性、可跟踪、可测的评价指标,对高校“三全育人”工作质量开展评价,以期逐步完善体制机制,有针对性加强育人工作指导。要彰显大数据时代高校大思政建设的时代特征、理论特征、实践特征,将定量评价方法引入高校“三全育人”工作,客观描述、反映当今高校的特质,以增强高校“三全育人”工作评价的科学性。

(三) 价值性和知识性的统一

没有价值定向的评价是盲目无序的评价,同时,价值评价是基于一定认识基础上并不断深化的过程。高校“三全育人”评价内容是育人工作的实然状况,即“事实”的评价;作为“指挥棒”,评价又具有导向性、引领性特征。高校“三全育人”评价是对高校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提升育人工作质量的判断,判断其教育活动是否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及实现的程度。

从认识论维度看,评价是主体对客体及其属性的判断认识,对照预定的标准作为尺子来测量是否达标以及现实状况发展水平。高校大思政格局的系统性、复杂性,“三全育人”工作的“全员、全程、全方位”要求,人才发展的周期性、全面性,这些决定了评价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建立较长的周期,进行多轮次的评价,形成一个“开展工作、对照检查、质量评价、发现问题、改进完善、开展工作……”循环往复的闭环过程,以引领促进“三全育人”工作不断地改革创新,提升质量。从价值论维度看,包括客观价值和主观价值评价、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评价。客观价值是指大思政格局中高校“三全育人”工作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等是否符合人才培养的客观发展规律;主观价值是指是否符合价值主体的目的和要求。

高校“三全育人”的终极价值在于落实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彰显了目的价值观和工具价值观的统一。首先,“为谁培养人”。这与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密切关联,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人才。其次,“培养什么样的人”。大思政格局中的“三全育人”归根到底是“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4]。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高校“三全育人”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服务功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育的是“四个服务”的全面发展的人。最后,“怎样培养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5]。高校“三全育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精神支柱、行动导向)为主要内容立德树人。“三全育人”评价是对高校育人质量的评价,关涉社会精神骨架构筑的基础工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筑。

二、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体系的构成

评价是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判断及其系列活动过程。主体依照所确立的目标,来测量客体的属性并将其转化为主观效用。评价体系包括评价主体、评价客体、客体属性及主体的评估标准等基本要素。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体系包括主体、客体、标准、方法及评价参照等内在关联的几个子系统。

(一) 主体系统

教育评价是具体历史条件下开展的实践性课题。评价主体总是处于特定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思想理念之中。所以,主体价值观念、评价导向、标准方法等,直接关涉对客体属性的判断认识。评价主体不同,对客体、主体需要及其与客观属性关系的认识是不同的。依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评价主体

系统包括党委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社会五类评价主体。广义上,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主体包括教育主管部门、教师、学生、社会。狭义上,从管理工作出发,评价主体指的是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当然,作为高校“三全育人”的基本要素,教职员和学生对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等具体育人环节中的现状最有发言权,他们也属于评价主体,其评价为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三全育人”成效评价提供参考。

(二) 客体系统

客体系统指的是进入主体认识和判断视域的客观属性。高校“三全育人”工作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中,在不同的评价阶段,评价的客体属性不同。全国各地各类高校“三全育人”工作千差万别、发展水平高低不同,管理层级具有复杂性。如何对这些不同地区、不同类别高校的“三全育人”工作进行评价,在丰富多彩的个性中总结抽取共性特征作为评价标准,是首要任务。

以高校“三全育人”的工作现状为评价对象。首先,重点评价高校党委对“三全育人”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是否健全以及统筹与实施情况,确保党对“三全育人”工作的全面领导。其次,“十大育人体系”建设情况。2017年12月,教育部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一体化构建“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的“十大育人体系”^[6],为高校构建大思政格局提供制度保障。再次,高校“三全育人”政策的队伍经费等保障情况。最后,各高校在“三全育人”的观念、内容、手段、机制等方面的特色和创新。

(三) 目标系统

高校“三全”育人评价决策主体和评价主体决定着评价目标系统。科学、公正、客观地评价需要有反映评价主体目标的统一的评价标准。标准具有两个特性:一是信息性,基于高校“三全”育人工作各个领域系统运行状况的信息,分析问

题、预测趋势、提供决策参考；二是判定性，对高校“三全”育人状态的价值判断。可操作性、可比性，参照点、基准点多为教育行政目标规定的某些标准，便于对高校“三全育人”状态作出判断。评价标准是决策主体和评价主体对客体属性价值判断，是客体属性和外部环境属性与目标体系相结合的产物。标准实质上是一把衡量效果的尺子，尺子在度量衡上的统一，是保证评价科学性、准确性、公正性的前提条件。评价目标是根据发展实际情况判断目标的完成情况及其主要示范性成果。

评价指标体系是对评价标准的具体要求。目前，应依据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开展“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建设标准，设定评价指标体系，使评价更客观、更符合高校“三全育人”工作实际，便于上级主管部门的对口管理。

（四）方法体系

高校“三全育人”评价的方法体系，是指根据评价主客体的特点所采用的具体方法系统。评价的方法体系不仅包括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方法、评价数据综合方法、评价主管领导意见表达方法等，还包括评价网络平台上传资料、图片、视频的方法，以及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的具体操作等。科学评价是高校“三全育人”各项工作的重要环节，需要科学化指引，也需要科学评价方法。数字化、信息化为高校“三全育人”工作的量化研究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保证。

（五）参照系统

参照系统是评价活动价值判断的基准，或是历次评价的结论，或是主体价值观或主观效用方面。评价结果作为横向（同类院校之间）的比较研究和纵向（不同类别高校之间、各高校自身建设的年度）的比较研究。参照系统的意义在于通过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依据评价结果，分析提升高校“三全育人”工作质量的思路与方法。

发掘分析高校“三全育人”工作的现状与不足，找准改进与完善思路。

从“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传家宝”到深化“三全育人”实践，到构建大思政格局，再到大思政格局下的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从事实认识的解释层面到实践经验层面，再到理论价值层面的升华，赋予技术性的调查、评价以明确的价值定向，既尊重经验和感受原则，又重眼前的实存状况，把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随着实践的深化和人的认识能力的提升，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体制机制将会日趋完善。

三、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体系的应用

“三全育人”集中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检验标准，是教育基础性工程中的核心环节。高校“三全育人”不再局限于传统观念中的学校教育，而是全员、全程、全方位“三位一体”，内外联动地构建育人格局。

（一）教育主管部门用好“指挥棒”

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主体主要是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第三方组织。评价也是一种特殊的管理行为，评价强化了高校“三全育人”的各类管理活动和管理绩效，评价过程也即管理过程。

一是统筹管理。评价是对事实和价值进行判断的实践活动。教育主管部门通过统筹兼顾、统一部署，明确高校“三全育人”评价的目的、对象，制定标准、指标，收集、处理信息，反馈结果等环节，始终发挥评价在导向、诊断、调控、改进等方面的“指挥棒”作用，督促高校达到基本的育人质量要求，优化高校“三全育人”整体工作。

二是客观评价。对高校“三全育人”作出客观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严格遵循标准，采用材料审核、实地考察、调查问卷等方式，准确收集、处理评价所需各种信息，形成符合高校“三全育人”工作实际的评价结论。评价客体属性的揭示与主体认识水平能力密切相关，通常由教育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评价，这样可以排除人为因

素,更易于开展专业客观评价。我国早在1984年就加入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并成立中国IEA国家中心,运用共同评价语言,参与国际教育评价。未来,高校“三全育人”评价可纳入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专业化评价工作。

三是指导帮带。高校类别不同、所处地区不同、发展定位不同,存在很大差异,“三全育人”发展有快有慢。教育主管部门应分批次推进高校“三全育人”评价,开办“三全育人”评价培训班,明确评价目的、实施流程,并通过典型引领示范,形成激励竞争机制。同时,展示相关高校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创新、服务社会、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育人经验、创新路径,通过指导帮带,促进相关高校对照标准,不断提升育人质量。

(二) 高校完善“十大育人体系”

高校要对照“三全育人”评价指标体系,不断完善“十大育人体系”。依据2017年12月教育部党组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一体化构建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十大育人体系”为核心的评价指标体系。高校“十大育人体系”涉及上级教育部门管理,便于相应部门的牵头归口管理。例如,统筹推进“课程育人”中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工作,由教育部社科司、教材局牵头,职成司、高教司、民族司、思政司、研究生司、巡视办等部门参与。

一是健全制度机制。健全以“三全”为基础、“育人”为关键的制度机制。高校组织领导“三全育人”工作,要坚持政治标准,突出价值引领,凝聚引导服务。要发挥工会、共青团、学生会、学生社团等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央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和党务工作队伍建设的政策要求和量化指标落地,将思想政治工作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工作同时部署和检查评估,不断完善“十大育人体系”。

二是促进均衡发展。“十大育人体系”的协调发展是高校“三全育人”的重要保障支撑。通过优化科研环节和程序,完善科研评价标准,构建集教育、预防、监督、惩治于一体的学术诚信体系,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例如,课程育人中,思政课程建设和课程思政建设要均衡协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全员参与、齐抓共管,需要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教书与育人相结合、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结合。从学生发展的一生来看,大学期间是人生阶段的“一段渠”,教职员要守好学生在校期间的这“一段渠”,把责任田种好。从教职员视角,在自己最熟悉的业务范围、最擅长的专业领域中都有为有位。

(三) 数字化赋能评价长效机制

数字技术拓展育人的时间与空间,有助于增强互动体验、支持个性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数字技术赋能评价,更加有利于及时采集、获取类型多样的数据,有利于数据的加工和应用,从而有助于评价长效机制的建立健全。

一是全员全程评价。数字技术有助于掌握全员参与“三全育人”的岗位职责情况。了解学生入学至毕业、从课堂到实践、从线下到线上,全过程、全方位的学习生活的相关数据,通过动态观测和分析学生思想状况、生活学习需求等,有针对性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学业辅导、就业服务、困难资助、心理支持等方面的精准化智能化服务。高校“三全育人”评价主要采用“网上申报”“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等多种方法采集各条评价指标的相关数据。采用“状态描述法”,有效地把主观评价结果转化为量化数值,便于统计计算;再经过计算机处理,得出测评的总分,这能有效地把主观评价结果转化为量化数值。

二是全面客观展现。以客观数据彰显大数据时代高校“三全育人”特征,是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和诊断性评价的有机统一。数字技术充分

展现高校“三全育人”的成效,也能够揭示出育人体系建设中的短板弱项,以便及时查漏补缺。

三是提供决策参考。高校“三全育人”评价,既评估最终结果,也考核努力程度及进步发展。通过数据管理和信息化建设,搭建育人评价信息化平台,实时开展监控和分析育人评价数据,为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提供决策参考,推动高校“三全育人”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逐步提高。

参考文献:

[1][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3、44.

[2][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77、339.

[3]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7.

[6]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的通知[EB/OL](2017-12-06).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s7060/201712/t20171206_320698.html.

责任编辑:王天海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实现“双创”目标的 思考与探索

肖丽丽 王 妍

摘要: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地位、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结合中的引领作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比较优势,对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目标提出具体建议。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世界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中华文明在彰显出强大生命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在兼容并蓄的前提下,坚持中华文化的原有特色,大力宣扬中华文化的丰硕成果,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优秀面貌,彰显文化自信,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内核与人类文明发展高度契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在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融合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认同,并在经年累月的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和文明面貌。就世界

文化发展和文明延续看,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经历五千多年从未中断的文明,是世界公认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文明。

回望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好像一条由无数涓涓细流汇集而成的河流,在这条奔腾前行的河流中,各个时期激荡着不同的音符。虽然儒家学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这条文化河流的主旋律,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是在兼容并蓄、文化互鉴中前行。这一进程不但没有削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特色,反而使其更加耀眼。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众多的学术流派中,儒家学说的核心理念历经各个历史阶段,成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价值观。民本思想、仁爱理念、家国情怀、义利兼顾、天下大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等观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收稿日期:2023-07-06

作者简介:肖丽丽,青岛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王妍,青岛理工大学宣传部新闻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政务媒体可视化传播策略、高等教育新闻实务。

主要内容。历史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及其发展，与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毛泽东同志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2] 因此，客观辩证地总结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去伪存真，取其精华，是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条件和正确态度。

二、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新面貌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丰饶的文化土壤里，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自古以来，对于怎么认识世界、解释世界，从而掌握世界，许多智者先贤著书立说，提出不同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吸收归纳总结智者先贤们深刻的思想内涵，提出了认识事物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这是人类历史上认识论、方法论的革命性突破，是人类正确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的钥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使我们能够辩证地研究客观世界，掌握其规律，在认识世界的同时，更好地改造世界，解决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世界观价值观的根本改变。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人们社会行为的标识，也是一个政党性质的本质体现。因此，“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

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把握文化传承性质的根本落脚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不但是文化成果的感受者，而且是文化发展的参与者、创造者。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心声通过文化形式的充分表达。没有人民大众的广泛参与，就不可能有为服务的大众文化的发展。因此，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历史观、文化观和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人民当家做主，为人民服务，这是新时代执政党最核心的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全体人民的共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自信自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全国人民英勇奋斗，发愤图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在几十年的奋斗中，迅速富起来强起来。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变，民族自信心有了空前的提高。中华民族为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倍感骄傲和自豪，展示出新的时代风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应新时代发展新面貌的魂。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结合，让二者在结合中彼此契合，互相成就。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从而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3]。

三、文明比较视野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优势与文化自信

文化传统的传承和文化理念的普及，总是伴随着时代课题的正确解答。就世界文明发展来看，虽然世界文明形态各有千秋，但就根本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取向来看，实际上就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以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文明，曾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推动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了解放思想、唤起民众的作用。资产阶级所推行的民主宪政制度一度也发挥了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文艺复兴为标志的思想解放，使西方文明再一次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但是，经过五百多年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开始显露，西方文明的衰落日益显现。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深刻阐释了对于人类文明的总体观点，他在与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指出，西方无法引导人类未来文明，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他认为在漫长的岁月里，尽管中国多次经历混乱与解体，但是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中，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的世界主义模式可以为今天的人类提供宝贵经验。中国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都保持着人类社会中可贵的天下主义的精神，中国文化是距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的。同时，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国文明符合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儒家和佛教，都存在合理主义思想，使得中国人在漫长的时代中有分寸地建立和坚守着自己的文明；道家思想对宇宙和人类之间奥义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不以为然，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的哲学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已经得到或正在得到全世

界有识之士的深刻认识和深度认可。

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各个民族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协同，人类进入了命运休戚与共的新时代，追求和平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目标。而作为文化理念的价值观，也在人类共同面对未来的时候越来越趋同。因此，比较世界各类文化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更加凸现出光辉的价值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代表了实现人类文明终极目标的总体方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和重要遗产。当前，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种全球性问题摆在世人面前。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也是面对世界新的发展趋势提出的中国思路、中国方案。面对时代课题，努力推动“双创”目标的实现，应切实做好以下工作。

深刻认识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坚决抵制错误思想。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和激烈斗争。在国民自信心日益增强的同时，一些旧的观念习俗、不良风气也沉渣泛起，重新回潮。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双创”目标，首要的前提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统领我们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坚定自己的立场，树立起全新的文化自信，拿起思想文化批判的武器，在广泛吸取世界各种先进文化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和现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深入总结、剔除糟粕、取其精华、发扬光大，又要防止盲目复古、厚古薄今；对西方及其他文化，既要敞开胸怀、兼容并蓄，又要认真鉴别，防止良莠不分。

建立系统深入研究弘扬中华文化的骨干队伍。应把“双创”作为长期任务，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整合各方面力量，建立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对中华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中华文化历史久远，博大精深，即使到今

天,也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中华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其中的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及荆楚文化等众多的文化形态各具特色,应有针对性地组织挖掘、整理、保护、归纳,系统性总结,特别对那些濒临失传的文化遗存,应进行抢救性挖掘和保护。应制定相应政策,对文化传承人或有专门特长的技术人才进行保护和奖励,促进人才辈出,为世界文明增光添彩。

充分发挥党的媒体的引领作用,占领舆论高地,引导舆论走向。党的媒体是党的喉舌,是党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无论在什么时候,不应弱化,只能加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舆情多样性、舆论多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党的媒体应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扩大影响力。

采取多种形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文化普及从内容到形式都应“活”起来,内容上要有新东西,形式上要多样化。在适应时代要求不断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精神内涵的前提下,尝试各种现代表达形式,充分运用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手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人

们的生产生活中。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要以世界其他国家、民族便于接受的各种形式,大力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只要我们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们生产生活相接相融,与世界相融通,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就会产生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会在新时代的土壤中展现出更加炫丽的姿态。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34.
- [2]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EB/OL].(2014-10-13).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4-10/13/content_2764226.htm.
- [3]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6.
-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2.

责任编辑:宋好